



吉庆街艺人来自全国各地，有专业院团的职业演员，有未经专业训练的“草根”。他们一年365天，昼伏夜出，晚上卖艺到转钟，凌晨上床睡觉，下午4点多又迎来新一天的挑战，白天还要抽空搞创作、练习唱段曲目。演艺生涯中，有多少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只能默默承受。

杨阳，中国汪派琵琶第三代嫡传弟子，武汉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本可颐养天年的他，因为儿子在乌克兰学习钢琴需要巨额学费，于是和几个老伙计组成乐队来吉庆街献艺。曾经过着悠闲的生活，而今整日与江湖艺人为伍，并面对客人的挑剔和责难，最初多少有些难为情。但慢慢地，杨阳也就豁达释然了，这就是生活啊。他开始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不再躲闪媒体的采访，并沉浸在与客人的互动中。图为2012年7月17日，当杨阳（右）演奏新疆曲目《达坂城的姑娘》时，一位美女食客一时兴起，起座献舞助兴，场面煞是好看。

（图/文 周国献）

目 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谭仁杰 彭富春
陈邈馨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邹仕芳 张 霞 陆建军
陈立新 姚四平 曾艳红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张川蕾
编 辑：华 蕾 游 迎
封 面 设 计：王 鹏

城市之根

<<< <

4 鸭子“考古”带来的新发现 / 韩用祥

扶贫路上

<<< <

8 真情浇开幸福花 “空壳村”走上致富路
/ 郑祖喜

12 衔来春泥作大厦 / 王燕常（口述） 刘伟畅（整理）

精工匠心

<<< <

17 追逐梦想，我永远在路上 / 杨 军

山有黄门

<<< <

22 王道俊：投身主体教育的教育学家 / 董中锋

26 中南民大：我心中的图腾 / 彭英明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0 年第 8 期 (总第 334 期)

委员天地

<<< <

- 34 我在光谷的三次身份转变 / 金 婵
39 传承武道创宏业 反哺木兰桑梓情
/ 甘治国(口述) 穆 艳(整理)

往事漫忆

<<< <

- 43 仁者巨匠 国坝之魂
——追忆在郑守仁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 / 陈 磊
48 我的三件“防护服” / 章 旂

史海钩沉

<<< <

- 52 “最老大智门火车站”现身汉口 / 侯红志

都市史话

<<< <

- 56 老武汉商业习俗一二 / 王琼辉

楚风汉韵

<<< <

- 61 潜翁《鄂渚纪闻》 / 王晓清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鸭子“考古”带来的新发现

◇ 韩用祥

盘龙城遗址的小嘴是一处南北向的低丘岗地，南北长约 500 米、东西宽约 50~150 米，地势中间高、两侧低缓。小嘴就在盘龙城遗址的西侧，距离西城墙不足百米，但在 21 世纪之前这里几乎没有过考古工作，可以说小嘴在一二十年之前一直是盘龙城考古的真空地带。

但就在 2008 年元旦，养殖场里的鸭子在小嘴用嘴巴啄出了一件商代青铜器，考古队员清理之后发现了一座商代墓葬和一座宋代墓葬，便自此有了鸭子“考古”的说法。经历过鸭子“考古”之后，盘龙城考古工作队在小嘴有了一系列重要新发现，如今已确定小嘴是盘龙城的青铜铸造作坊区，改写了盘龙城的历史。

外迁村民返回养鸭

为了保护盘龙城遗址，武汉市委、市政府下大力气把遗址核心区域上的两个村民组整体搬迁至巨龙大道南侧的盘龙城还建小区。搬迁后，一些村民因不适应新的小区生活，也不愿到异地谋生，看到搬迁后家乡水源丰富、农田闲置，于是就利用之前养鱼搭建的简易棚屋办起了养殖场。从外引进了多家养鸭老板，分别在王家嘴、小嘴、艾家嘴两侧湖水中养殖肉鸭，并利用鸭粪及残食料养鱼，形成了当时天然的特大型养鸭场。

每天，几万只鸭子在湖水与岸边活动，时时戏水拌动水底泥土，有时到岸边觅食。

天长日久一批又一批的成品鸭子从这里送往市场销售，一批又一批的小鸭苗又从种场送往这里，大鸭和小鸭混合养殖，年年如此反复。

随着湖面水位逐步抬高，湖岸边的陆地被湖水淹没区域逐步扩大，使表土成为湖边水面的底部，长期被水淹的坡地上的泥土，被喜欢在湖底觅食的鸭子用长嘴绞拌掀走。久而久之，个体较重的文物标本和结构紧密的遗迹便裸露出来。

鸭子“啄”出了古代墓葬

2008年元旦，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按照国家规定放假三天，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陈兴付留在单位值班。下午，太阳快要落山时，养殖场的黄丕涛匆匆忙忙跑到考古工作站对正在值班的陈兴付说：“你快去小嘴看一下吧，刚才在养殖场的湖边发现了青铜器。”陈兴付在黄丕涛的带领下来到小嘴，这时刘章付和李仁阶正守在发现青铜器的地点。陈兴付上前查看，只见一个小土坡上露出半件附着泥土的青铜鼎，四周是密密麻麻的浅坑，坡顶上面是一层厚厚的鸭粪，再看旁边正在“嘎嘎”叫的鸭群。陈兴付心里明白了，对养殖场的人说：“这是你们养殖场鸭子的‘杰作’啊，居然啄出了商代青铜器！说不定这里有一座商代墓葬哩。”

陈兴付随即向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主任鄂学玉汇报了发现青铜器的情况，考虑到天色渐晚，不便开展工作，于是决定先保护好现场，待明日上班后进行考古清理。

第二天一大早，鄂学玉主任带领刘森森、郑远华、陈兴付、余才山等考古专业人员来到小嘴现场查看发现的青铜鼎。这件青铜鼎看上去保存比较完整，用手铲把青铜鼎周围的土壤轻轻刮去一层，隐约可见墓圪痕迹。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座商代残墓，必须进行抢救性考古清理。

刘森森作为考古领队，指导工作人员在发现青铜鼎的土坡上面布置了一个考古探方。将表面的一层鸭粪清理后露出灰褐色的松软土壤，里面既有商代陶片又有现代砖瓦、玻璃渣，这层土壤厚5~25厘米，是近现代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扰土层。继续往下清理，逐渐露出一层土质比较硬的黄褐色土壤。黄丕涛在用铁锹铲平土壤的时候，突然听到“刺啦”一声，现场有经验的考古人员听出这是金属碰撞陶瓷的声音。于是，赶紧



2008年盘龙城遗址的小嘴考古现场

停止铁锹作业，换用手铲轻轻刮去浮土，土里埋的居然是瓷碗和陶罐！

刘森淼看过之后，断定瓷碗和陶罐是宋代的。对此，大家不免产生疑问：商代青铜器旁边出现了宋代的瓷碗、陶罐，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难道这里除了商代墓葬之外还有一座宋代墓葬？当把整个探方底部铲平之后，考古人员凭经验划出了两个交错的长方形墓葬边线，果然是宋代墓葬打破了商代墓葬。这一发现让大家很兴奋，因为在盘龙城遗址，商代以后的遗迹很少，晚期遗迹直接打破商代遗迹的现象更是少见。

按照考古工作规程，大家经过一整天的忙碌，终于把小嘴的两座墓葬——1号宋代墓、2号商代墓清理完毕。1号宋代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残长1.8米、宽0.88米、残深0.28米，仅出土了3件瓷碗和1件陶罐。2号商代墓西南侧被1号宋代墓打破，同样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残长1.9米、残宽1.1米、残深0.26米，仅出土了2件青铜器——青铜爵和青铜圆鼎。

鸭子“考古”之后的新发现

尽管村民主动上报发现文物的事迹值得表扬，但鸭子“考古”这种事情实际是对地下文化遗存的一种破坏，要予以必要的制止。

2012年前，鄂学玉等领导多次到养殖场进行巡查并制定了相应保护措施和办法，



盘龙城遗址小嘴湖边采集的残石范

在发现商代遗迹的地方覆盖厚毛毡进行保护，使养殖场范围内破坏文化遗存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2013年下半年，万琳院长到任后针对这种情况，劝说村民主动拆除鸭子养殖场。经过多方协调，最后对盘龙城遗址范围内地面所有临时建筑和鸭子养殖场进行了彻底清理，鸭子养殖厂全部迁出，使盘龙城遗址得到了有效保护。

12月16日，我作为文物保护部门的负责人到小嘴进行文物安全巡查。养殖场刚被拆除不久，小嘴中南端仍是光秃秃的一片，地表上的遗迹、遗物清晰可见。在小嘴岗地东坡中段的湖边，即被鸭子“考古”后经湖水冲刷的区域内发现一个红烧土圈遗迹和

几个黑灰土遗迹。这些遗迹的表面形状接近圆形，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比较少见。如此特殊的遗迹引起了我的注意，经验告诉我：特殊的遗迹往往伴随着重要文物。

于是，我在这些遗迹上及周边范围内进行仔细的观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时有一件倾斜的残石器映入我的眼帘，我用手轻轻一拨，从正面一看，石器虽厚但制作规整，内凹，有明显的边线，隐隐约约像一件器物的轮廓。由于有残缺，不能一下子认出它是什么功用的石器。说来也巧，我迈步抬头刚走了两步，又发现一块残石器，拿起来与前面刚捡到的残石器一拼，居然是一件完好无缺的石范，尺寸长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厚约6厘米，根据腔体形状来看，可能是用来铸造铜簋的。我在附近又找到5块残石范以及石斧、石镞、砺石、石刀各1件。

后来，经我院刘森森研究员和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研究确认为商代石范。我把发现石范的经过告诉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盘龙城考古工作站站长陈贤一先生。听到这一消息后，他非常激动地说：“小韩呀，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在盘龙城遗址上首次发现了至关重要的铸造遗物。我在盘龙城遗址工作了一生，到现在还在关注盘龙城遗址的相关信息，总认为盘龙城遗址应有铸造的场所，但一直没发现相关遗物遗迹，这个想法也只能是个推测。你发现这些石范残件也完成了我的心愿。你赶快和你们领导讲一下，把这次发现的遗物和遗迹写一篇简报整理出来，发到专业刊物上，让关注盘龙城的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都知道，这对于研究盘龙城商文化性质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我在院领导的支持和陈贤一先生的关心下，将这批遗物及遗迹进行了整理，以《盘龙城遗址首次发现铸

造有关的遗物遗迹》为题发表在全国核心期刊《江汉考古》2016年第2期上。

盘龙城遗址历年来就很少能发现与铸造生产青铜器有关的遗物，发现石范更是盘龙城考古工作中的第一次。这一重要发现引起了盘龙城考古工作队的重视。2015~2019年，连续五年对小嘴遗址进行持续发掘，发现了房基、长条沟、炉壁、陶范、砺石、铜渣、木炭等一系列与铸铜生产相关的遗存，最终确定小嘴是盘龙城商代时期的青铜铸造生产作坊。这些发现说明盘龙城商代先民有独立铸造生产青铜器的能力，对于研究盘龙城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小嘴考古工作还在继续，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小嘴的考古发现能为我们带来更多关于盘龙城的认识！

（韩用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保管陈列部主任、研究馆员）

真情浇开幸福花 “空壳村” 走上致富路

◇ 郑祖喜

我是江岸区球场街道办事处副调研员郑祖喜，另一个身份是球场街道派驻黄陂区木兰乡马鞍寨村扶贫工作队队长。2015年10月，我赴黄陂区木兰乡马鞍寨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上任的那天，我站在马鞍寨村村口，一眼望去，金秋十月，村里百亩良田杂草丛生。在前往村委的路上，村里留守的老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哎，又来了一个驻村干部。”原来，在我来之前已经有数位扶贫干部到村里工作了，不过都没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

马鞍寨村是黄陂区木兰乡12个重点贫困村之一，由于老村支部书记退休待遇得不到解决，成为了新洲、黄陂退休村支部书记信访牵头人，该村也成了信访的聚集地，曾号称“全市信访第一村”，问题多、困难多，好几年乡干部都不敢来。我刚到驻村工作队时，这里交通闭塞，无特色种植产业，无企

业入驻，基础设施落后，连小卖部都没有，村民主要收入靠外出务工，整个村的集体收入只有5斤茶叶，是典型的“空壳村”。如何抓班子、带队伍，是我时常思考的问题，我深感肩负的责任重，但我没有退缩，我在心底暗暗下决心要有所作为，从点滴小事做起，重塑班子形象，发挥党员作用，以此来赢得群众的信任。

在驻村近4年的时间里，我坚持履行第一书记的政治责任，带领区委党校、花桥街道的扶贫队员一起打冲锋、攻堡垒、破坚冰，坚持在扶贫攻坚一线谋事创业。我带领驻村工作队抓住信访问题的“牛鼻子”，成功化解退休支部书记待遇等信访矛盾，把“全市信访第一村”建设成了全市平安示范村、文明村；把村党支部建设成黄陂区先进党支部；村民由当年纷纷争当贫困户，改变成现在写申请退出贫困户。同时，我还协助

村里建成 120 千伏光伏发电基地，建成 200 亩油茶基地，并通过积极招商引资，使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20 万元以上，实现贫困村的自身“造血”，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路。村民们都说，“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村民偷塞蔬菜鸡蛋表信任

每个工作日，木兰乡马鞍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焦传辉都准时到达村委会，与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召开工作推进会，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工作。

然而 4 年前，马鞍寨村的干事氛围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大家工作没什么干劲”“做事拖拖拉拉”……当时的马鞍寨村党支部被认为是一个软弱涣散的党支部，村“两委”饱受村民诟病。

我上任之后，首先从党支部建设抓起，坚持每天碰头会、每周例会、每月支部主题党日，并率先示范，促进干部作风转变。还定下五大不成文的规定：不向村里提不合理要求，不接受任何吃请，不在村里报销开支，不接受群众钱物，不做违背群众意愿的事情。

在精准识别中，我把村里的 58 户贫困户 108 名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为 42 户 87 人，删除了 20 户 33 人，新增 4 户 12 人。由于当初矛盾主要集中在驻村工作队员上，我就带领驻村工作队员挨家挨户地做工作，首先从老党支部书记焦传德入手，和他推心置腹交谈了 4 个多小时，他最终同意将自己从贫困户中删除。有了这个好开头，犹如给我们注入了一

支“强心剂”，之后的精准识别工作也都推进得比较顺畅。在对新识别的 42 户贫困户 87 名贫困人口的公示中，没有接到任何群众举报，并且在省里开展的保基数除伪户的大检查中，我们马鞍寨村是少数没有问题的村之一，一举赢得大家的信任。

对待贫困户我们始终如一，无论是因大雪纷飞、暴雨如注等恶劣天气导致贫困户生活艰苦，还是遇到突发事故需要帮助，我们工作队员一直站在村民们身边，为他们排忧解难。我记得有一个冬夜下起了雪，气温突降，想到有几家卧床不起的五保户存在保暖问题，我和驻村队员顾不上休息，连夜走访，一家家看，一户户问。当走访到细朱湾 85 岁孤寡老人胡淑华家时，已经是深夜 11 点多了。我询问老人冷不冷、有没有困难时，她说她想要喝水，但家里的开水瓶里没有水，烧水的壶也坏了。我顾不上夜深，来到小队队长朱孝华的家帮老人讨热水。被叫醒的朱孝华开门后惊讶地说：“你们怎么还没有休息呀？”当我说明原由后，朱孝华赞许道：“你是我见到的最负责任的驻村干部。”



2017 年夏，郑祖喜（中）带领驻村干部实地查看贫困户家中受灾情况

驻村期间，马鞍寨村启动了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最初是由村里的一个村民承包的，但在施工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村民存在偷工减料的行为。于是，我连夜召集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召开村民大会，要求立即对该项目进行整改，这个承包的村民当场承认了错误，之后按照标准重新对基地进行了改建。我的较真一下子镇住了村“两委”班子的心，在我的带领和影响下，村“两委”和驻村干部拧成一股绳，一心为村民办实事。

风气变了，村里的面貌也渐渐有了很大的变化。村民们都很感谢驻村工作队，经常趁我们走访、外出时，偷偷将自家种的蔬菜、水果拿到村委会，我知道后会主动退回，但村民们都不愿意收，因此，我都会按斤两折算成现金一一退还，分毫不少地还给村民们。

困难户方国兴在接受省扶贫办宣传片制作人员采访时即兴创作了一首打油诗：

“屋外大雨纷纷下，驻村干部在我家，问来

做什么？担心我屋垮。”驻村干部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村里百姓的赞许。

把“空壳村”引上致富路

我始终坚持在真脱贫、脱真贫上下功夫。增收难是马鞍寨村面临的最大问题。面对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的局面，我和驻村工作队积极研究惠民政策。在一篇新闻报道中，我看到光伏发电项目，在深入了解后觉得我们马鞍寨村也可以做。随即，我和驻村工作队向市、区扶贫办递交了在村里实施光伏发电项目的申请。

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选中了村里的一块荒山，作为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基地。然而荒山的户主大部分在外务工，无法及时取得联系。我们克服困难，坚持一户户做工作，当大家听说是为村民办实事时，很快同意将荒山交给村里使用。最终经过多方努力，120千伏光伏发电基地在荒山上建成。我又积极引资开发100亩山地，使村集体年

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在项目推进的关键时期，我驻村两年的服务期限已到，村民们对我依依不舍，村委会也希望我能留下来。应大家要求，我选择继续坚守在马鞍寨村。2018年，马鞍寨村建成200亩油茶基地，预计3年后村集体收入可达70多万元。

村集体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生活条件也一天比一天好。焦华平是村里的五保户，住的是土坯危房，我见他家居住环境恶劣，为他申



2017年冬，郑祖喜（中）带领驻村干部到每家每户核对收入

请了危房改造项目。现在焦华平住进了村里出资建的新房，看着焕然一新的房子，他感慨地说：“这样的生活我以前想都不敢想。”

每天晚上六七点，83岁的朱焕勤总喜欢来到家门口的百姓大舞台，边锻炼边看村民们跳舞，这也是驻村工作队为村民们办的实事之一。村里的路修好了，家家户户门前安装了路灯，还修建了百姓大舞台，购买了音箱、健身器材等设备，村里的环境越来越美。如今，马鞍寨村正在一步步摘掉“空壳村”的帽子，三个村湾还被列入“美丽乡村”规划。驻村工作队还在筹备打造摄影基地、垂钓基地、猕猴桃基地，计划利用村里的油茶和绿茶基地建设油茶和茶叶加工厂，提高村级自身的“造血”功能。

激发村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脱贫攻坚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是防止返贫的重要途径。为了打好这场脱贫攻坚战，驻村工作队从真心帮到制度管，层层激发村民脱贫的内生动力。

在帮助贫困户脱贫的过程中，为保证每个贫困户都能有稳定收入，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帮扶有工作意愿的贫困户。我们积极协调，为2名大学毕业生和6名有就业需求的贫困户安排了工作岗位。贫困户焦秀丽大专毕业后，我们帮助其在金盾大酒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对有种养殖需求的贫困户，我们发动爱心人士为其免费提供养牛的巨菌草草种以及草料粉碎机；对于没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我们提供了一些公益性岗位，如在村内做保洁，在光伏发电基地、油茶基地进行维护等。

驻村工作队积极发挥“爱心超市”的

激励作用，提出贫困户和60岁以上的村民可以通过做公益在“爱心超市”积分，以此鼓励大家勤劳致富。贫困户焦咏清平时很懒散，只喜欢打牌混日子。为了让他增收，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经过商议，决定免费送他一头牛养殖，没想到他第二天却将牛还给了驻村队员。但我们并没有放弃帮扶他，不断给他灌输“爱心超市”积分兑换物资的理念，激发了他的脱贫内生动力。2018年，焦咏清靠维护光伏基地实现了增收5000元。

我们还通过树典型，起到引领作用。村民张文华是个残疾人，但他身残志坚、不等不靠，通过养牛实现了脱贫致富，《长江日报》曾经报道了他的事迹，在村里引起了极大反响。贫困家庭学生朱丽在扶贫干部的资助下完成了大学学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她就主动申请退出了贫困户。一石激起千层浪，日子有了起色的村民们互相比劲、互相争先，下决心努力做小康生活建设的奋进者，形成了人人争当脱贫典型的良好氛围。

通过“精准滴灌”式帮扶，马鞍寨村村民过去“等、靠、要”的懒惰思想遭到摒弃，勤劳致富的观念深入人心，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得到激发，村民文化素质显著提升。马鞍寨村从“空壳村”“全市信访第一村”，到被武汉市评为平安示范村、文明村，再到代表武汉市参加全省精准扶贫“两率一度”考评，获全市第一名，逐步摆脱贫困，展现出新的面貌，迸发出新的发展活力。我相信，马鞍寨村一定能够如期实现小康。

（郑祖喜：江岸区球场街道办事处副调研员）

衔来春泥作大厦

◇ 王燕常（口述） 刘伟畅（整理）

燕子意如何，但为营巢忙。2018年年初，听闻要选派干部到黄陂区驻村扶贫，原籍黄陂的我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厚意，主动从东西湖区长青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任上请缨到黄陂区蔡家榨街团山村，担任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兼精准扶贫攻坚工作队队长，成为长青街与团山村共建的“桥头堡”。近一年来，我始终把“脱贫如攻坚，攻坚莫畏难”作为格言激励自己和战友，时刻做到心中有群众、肩上扛责任。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我常跟自己和队员们说：“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成为驻村工作队队长后，我不仅仅是一名党员干部，更像一只辛劳的春燕，无论阳光里，还是风雨中，都一往无前地纵身飞翔，日复一日衔泥搭巢、铺草垫窝，把团山村脱贫攻坚的大厦营建得结实、美观、温暖。

一户一策求精准

“情况不明、底数不清、信息不对称，真扶贫、真脱贫、精准扶贫就是一句空话。”这是我到驻点村后的第一句话。头一个月，我带领战友深入贫困户、村老干部、在职村“两委”成员和村中能人家庭走访190余人次，全面掌握现有16户建卡贫困户的家庭情况和致贫原因。以“五个一批”为抓手，“准”字当头、一户一策，与长青街包保干部一道为帮扶户量身定制年度精准脱贫计划并公示。为保证计划落实落地，我坚持每月到贫困户家中走访2次以上，嘘寒问暖、措施入户、风雨无阻，每周例会进行帮扶情况回顾、每月进行措施推进进度分析，做到新政策出台时第一时间入户宣传、贫困户家

中有变故时第一时间到位、包保干部人事变化时第一时间动态调整。

困难户汤志亮和妻子徐宝玉有农业技术在身，靠双手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充足。但是据我的了解，多年来，夫妻俩靠炸油条、麻花挣的钱仅仅够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如何帮助其脱贫致富奔小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了解熟悉政策，认为扶贫小额信贷可以解决汤志亮夫妇创业资金困难的问题。但是一听说要贷款，夫妻俩的抵触情绪较大，认为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再背上贷款无疑是雪上加霜。为此，我与村书记多次上门宣讲政策，安抚他们的畏惧情绪，告诉他们只需先期支付1500元利息，后期蔡家榨街会拨付资金将利息补偿给他们。经过我的协调和努力，3万元的扶贫贷款终于到了汤志亮夫妇手中。手里有了资金，创业干事就简单多了，汤志亮夫妇决定发展太空莲种植和小龙虾养殖产业，我又帮助联系了东西湖区农业局的技术专家给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2019年年底，汤志亮一家依靠小龙虾和太空莲种养殖经济上增收5万元，加上家庭小炸坊销售油条和麻花的收入，全家一年可支配收入达到8万元。“油条姐”徐宝玉为此非常感谢工作队，我笑着说：“是我们应该感谢您，不然每周哪里去买这么好的原生态小龙虾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哦。”

困难户韩金海的丈夫残疾、两个孙女分别上小学和中学，在做好政策兜底工作的同时，我和村干部一道为他们家实现“雨露计划”“金凤计划”的无缝对接。2018

年8月，韩金海的大孙女汤祎考上湖南的一所一本学院，得知这一喜讯，我个人为她捐助了800元助学金。

日积月累的扎实工作，只是为了保证扶贫政策落实的执行力、帮扶措施落地的时效性。在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团山村的危房改造、医疗、教育等扶贫工作走在全街前列，实现了贫困户脱贫出列后工作成效的再巩固、再提升。

产业扶贫拓路径

项目不准、产业不兴，集体经济跛腿，靠吃“救济粮”，村里就没有出路。我深刻认识到产业发展对村域精准脱贫、村湾振兴的重要性。

经了解，2017年，前任驻村队长引进了长青街企业鑫汉义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到团山村发展产业，驻村扶贫。第一次发展了红薯粉加工产业，公司免费发放10万棵红薯种苗给农户，成熟后按市场价收购进行



2018年9月，东西湖区长青街团工委到黄浦区蔡家榨街团山村举办科普夏令营



2018年10月，王燕常（中）在鑫汉义公司园区丈量土地

加工。但是由于团山村土地砂石含量过高，成熟的红薯形状不一，中间还会掺杂不少砂石，加工处理的成本大大增加，因此该产业只维持了一年就宣告失败。之后尝试发展的牡丹种植产业也以失败告终。我驻村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到鑫汉义公司园区考察多次，认为130亩流转面积（包含3个水塘）可以发展禽类养殖。鑫汉义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老板朱汉义听取了我的建议，经过考察和调研，决定发展狮头鹅养殖，并与安徽鹅肝酱加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2020年，即使受到疫情影响，在工作队线上线下跑销售的帮助下，成功销售了2000只鹅。如今，村里已经与湖北赢城集团签订合同，定向收购成品鹅。

然而，帮助鑫汉义公司发展只能在用工上帮助贫困户增加少量收入，如何帮助团山村和贫困户长期可持续致富、如何建立村支柱产业依然是个难题。我带领工作队员多次到姚家集街青联村、淳河村考察黑斑蛙基地，到凤凰寨村和四勿岗村考察油茶种植

基地，可依旧没能找到适合我村发展的产业。我结合团山村土地特性，认为艾草是比较适合种植的。2019年年底，我与村书记、村中能人汤红波一同赴河南南阳考察，了解到艾草对土壤要求低，容易种植，存活率高，且经过粗加工就能卖个好价钱。我决定在团山村建立艾草种植基地，发展中草药种植产业。产业发展刻不容缓，疫情后一到村，我就积极奔走协调，4月份成

立了团山村勇波农村合作社，5月底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完成了土地流转，目前已获得许可开始开工建设。合作社带头人汤红波说，希望团山村能在他们这代人手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希望团山村能在我驻村工作的时间里添新衣换新颜。团山村16户贫困户是我永远的家人，家人有钱赚，生活越过越好，是我唯一的心愿。

红色工程当头雁

“群雁无头难自飞。”作为第一书记，当好“红色头雁”，实现“红色工程”固本强基是应尽之责。围绕农村党组织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发挥领导作用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把工作职责精炼为“指导、帮扶、监督”三条，把工作归纳为“党建引领、脱贫攻坚、社会治理”三大板块并身体力行。倡导村里建立了工作队、村“两委”每月联席会议制度。充实村监委会班子，健全村“15

分钟生活圈”，成立了文化、卫生、法律、金融等7个志愿服务工作队，有效激活“红色细胞”。完善村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村委会日常管理制度等9项制度。我指导村党支部规范化发展党员，推荐积极分子王世强入党并被接收，使能人回乡实现在组织内的重塑。为加大对口帮扶力度，我要求工作队承担起长青街对口帮扶“先遣队”的职能，组织长青街所属单位压茬到团山村开展“党员一日捐”、义诊送药、“七一”联办会演、科普培训等多种形式的11次结对共建活动。

远山僻村换新颜

团山村地处偏远，民风纯朴的同时，村民交通、获取资讯、融入现代生活的渠道相对阻塞。如何进一步开启民智、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我的对策是以文化人，宣传融心、融智、融力的“三融”理念。基层工作要讲究简单实效，便于老百姓接受。我首先结合村湾特色，号召一批村里的妇女同志成立了团山村业余广场舞舞蹈队，两次邀请长青街老年大学专业舞蹈老师系统指导。一开始，舞蹈队只有8人参与，下班后在村委会文化广场集中练习时，周遭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觉得有趣却因为守旧思想不敢迈出步伐加入进来。随着舞蹈队动作越来越专业整齐，富有节奏的舞曲也撬开了跃跃欲试群众心里的枷锁，目前舞蹈队已经扩大到

20人的规模，还参加了蔡家榨街广场舞舞蹈大赛，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根据舞蹈队为解放村民思想打下的基础，我趁热打铁，以扶贫先扶志与智作先导，精心制定了《团山村文化扶贫三年工作方案》并稳步实施。争取到了29万元帮扶资金，帮助团山村修建文化广场，健全配套设施，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又筹措20万元修建了大型LED户外电子显示屏、宣传文化长廊，完善了综合活动室设施，新增了篮球架、乒乓球台等健身器材，协调村里获赠户外健身路径1套。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团山村文化氛围日渐浓厚，文化和全民健身活动蔚然成风，作为“一村一品”健身舞蹈项目建设取得较好成效，基本实现了“走出来、跳起来、乐起来、富起来”的既定目标，贫困户、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

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我认为，作为我们国家“后浪”的这些留守



2019年7月，王燕常（中）查看贫困户徐宝玉的太空莲塘

儿童，他们的思想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这 1.6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因此我联系了长青街团工委，每年 7 月到团山村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科普知识夏令营活动，为村里的留守儿童开设科普小课堂，与他们一起做手工制品。

2020 年 4 月，我与村委会商议成立了村湾环境保障队，吸纳轻微智力障碍但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加入，每月发放 400 元工资。一方面保障村湾环境，打造美丽乡村，另一方面能给贫困户增加稳定收入。为帮助有轻微智力障碍的贫困户王胜、蔡从友尽快胜任工作岗位，我亲自带领他们做劳动，指导他们使用扫帚、辨认需要清理的垃圾，一开始他们还存在畏难情绪，我一边做示范，一边细心开导，到现在，他们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劳动作业。

抗击疫情保民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按照市扶贫办的要求，驻村工作队不得进村。伴随着复工复产时间的一次次延后，我对团山村村民的牵挂和担心也一天天加重。我要求工作队员每人负责联系几名贫困户，并每天和村“两委”成员通电话，了解团山村防疫情况，贫困户是否有生活困难。每周二召开一次微信视频会议，交流各自了解到的信息，安排布置下一步工作。在这次疫情期间，我们之前建立的“爱心超市”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要求特殊时期采取特殊办法，开放“爱心超市”给贫困户和物资紧缺的村民，保障疫情期间村民们的生活补给。经过工作队与村“两委”的共同努力，团山村一直是无疫情村。

与此同时，我代表工作队两次向街党工委请缨，参与到长青街防疫工作中。我牵头负责街发热人员送诊和三类人群 CT 检查，

另外三名队员分别下沉到社区卡点值班。3 月 26 日到村之前，工作队员们在各自的防疫岗位上表现出众，都顺利完成了任务。

越是条件艰苦越要有所作为，越是地处偏远越要让党工委放心。驻村期间唯一使我遗憾的，是因为工作繁忙没能陪伴儿子复习中考，没来得及看身患肝癌的父亲最后一眼。可当团山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文明因子逐步融入村风民俗，当河汊水渠不再污溢淤积，当团山村村容村貌整洁如洗时，我并不后悔，我相信我的家人也能理解我作为扶贫干部身上肩负的重任。

寒暑易节，不管春去秋来我自飞，我用执着和开拓书写着对长青街党工委的庄严承诺。在初冬的暖阳里，在轻凉的空气中，在漫山红黄的点染下，在硕果累累的枝头上，我要化身为飞翔的燕子继续前行在凝心聚力精准脱贫的征途上，谱出一支春天的赞歌。

（王燕常：东西湖区长青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驻黄陂区蔡家榨街团山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刘伟畅：东西湖区长青街道办事处四大队工作人员，驻黄陂区蔡家榨街团山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追逐梦想，我永远在路上

◇ 杨 军

我叫杨军，现年45岁，曾任东风公司技术中心动力总成试验室主任技师，目前担任东风公司技术中心首席工种师，坚守于汽车动力总成试验阵地25年，我致力于为东风自主品牌汽车打造动力澎湃的“自主芯”。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即推动“武汉制造”向“武汉创造”转变，我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向前。

25年来，我斩获累累殊荣，如2012年获得中国科协、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颁发的全国“讲理想、比贡献”科技标兵荣誉称号；2015年成为武汉市“黄鹤英才”高技能专家；2017年获评武汉市首席技师；2018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当选武汉市“大城工匠”；2019年被评为湖北省“荆楚工匠”、湖北省首席技师，获得“武汉五一劳动奖章”。然而，荣誉对我来说淡如烟云，它们只不过是人生路上的种种符

号而已，我认为人生最为精彩的应该是在艰难的跋涉中执着追求。只要不断去追求、去拼搏，路就会在自己的脚下。追逐，才能成就最美丽的人生。

爱于车，痴于车

1969年，在鄂西北深山的小山村十堰，数十万人投身到建设二汽的洪流中，这就是东风汽车的起点。建设东风，源于毛主席“要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战略指示。东风由此也成为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设的汽车企业。

1975年7月，我出生于十堰一个工人家庭。也许是受父辈“第一代东风人”艰苦朴素精神及实干创业、重知识、重技能、识大体品性的濡染，亦或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促成，我自幼喜爱机械，喜爱汽车，

做事用心专一，爱动脑勤动手。读技校时，我选择了与汽车相关的“东风技校汽车试验班”就读。

1994年，我技校毕业，恰逢东风招聘汽车发动机试验人员，我凭借自己深厚的知识技能功底，顺利地通过了东风人才交流中心组织的招聘考核，以优异的成绩被东风录用，从此，我开始了与汽车发动机“相依为伴”的日子。

入职伊始，我便对汽车工业、汽车技术痴迷不已。尽管我的学历、我的专业与现实的工作并不完全对接，但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我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发动机试验之中。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工作不久，我便理清了工作思路，并越来越喜爱这份工作。在这段技能的快速成长期，我已经不记得拆过多少个发动机了。发动机是个精细件儿，一颗小螺栓都马虎不得，拆得多了，心里就有底了。拆着拆着，我就在心里画出了发动机的解剖图，为什么甲移动会影响到乙？为什么乙加厚会牵连到丙？这些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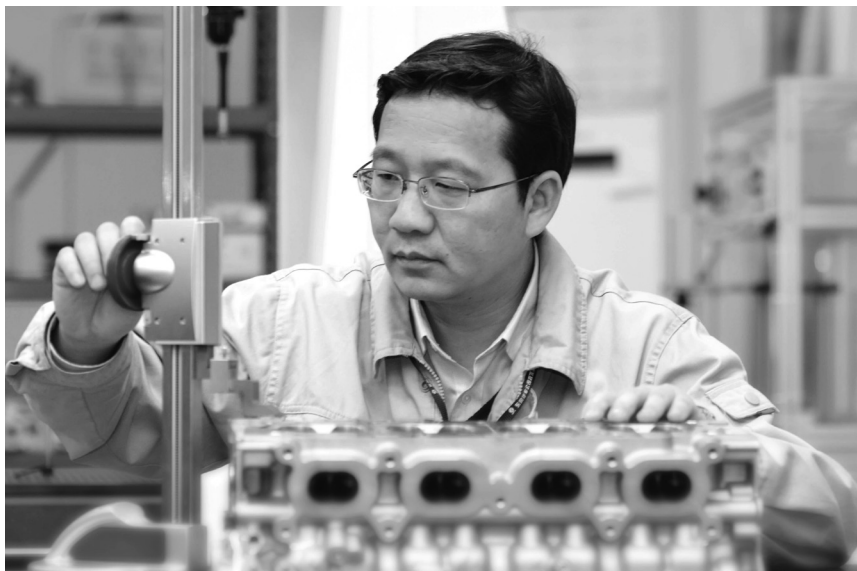
书上也许会写，但是到底不如手摸出来的见识深刻。当拥有第一台车的时候，我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感受发动机。那是台老富康，没现在的机器好听，不过现在的发动机太复杂了，没工具没仪器，我也不敢再在家里拆着玩了。我对工作的热情感染着身边的人，我的勤学苦练得到了父辈们的首肯，技术中心的同事们也对我敬业的精神称赞不已。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东风部分公司迁往武汉。面对此机遇，我决定离开父母的羽翼，自立、自强，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磨炼意志，去学习本领。1997年，怀抱梦想的我来到了武汉，就职于神龙汽车公司技术中心的发动机试验室。就在这个试验室里，我不断学习成长，度过了自己的花样年华，同时累积了入职以来难得的第一份独立的工作经历，为随后入职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因工作需要，我调入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在这个技术中心，我发扬艰苦创业、敢作敢为的精神，踏踏实实、勤奋钻研，做好自己的工作，遇到困难不退缩，

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久，我便成长为发动机试验室试验运行团队领头人。

不论是在神龙汽车公司技术中心的发动机试验室，还是在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的发动机试验室，我总是立足于艰苦试验的第一线。我痴心于发动机试验工作是人所皆知的。一款又一款、一轮又一轮的发动机研发，我用认真



2016年，杨军进行自主研发发动机的拆装检查

负责的态度，细致执着、不怕吃苦的精神，保障和捍卫着研发成果。同时，日积月累的实践，造就了我精湛卓越的专业技能。在技术中心的自主研发中，我总能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并保持着试验任务零事故的良好业绩，小技师们都亲切地称我为“杨师父”。

爱于车，精于车

2009年，东风公司汽车中心开始投建发动机试验室，同时面临着东风自主品牌首款乘用车“风神S30”投向市场的艰巨任务，一边是试验室筹建，一边是新机型的开发验证试验，难度可想而知。我主动请缨，承担起发动机试验室建设及新机型试验任务。虽然自己在合资公司工作过，有一定的经验，但全面负责台架设备安装调试，尚属首次。如何系统地进行规划安排，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那时候发动机试验室只是一块建筑工地，建设起来困难重重，我没有退缩，而是以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我对自己说：“态度决定高度，细节决定成败。”那年夏天，我日日坚守一线，在工作中学习，向建设专家和供应商请教，很快使自己成长为试验室筹建团队中的骨干；与此同时，为配合中心自主发动机研发工作，我肩负起了试验台架安装、调试、验收任务，并承担了研发的新款发动机的测量、装配、台架试验、整车搭载等任务。在前期自主品牌发动机试制、装配过程中，为确保装配质量，我仔细观察、分析缸体结构等部件，并与设计人员充分讨论，设计相应的工装夹具。经过反复验证，我简化流程，优化了传统拆装方法，其中，“自主品牌A系列发动机飞轮锁止器”等设计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在公司内部广泛推

广和应用。最终，我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东风公司首款自主品牌乘用车发动机的研发试验任务，发动机台架共安全运行95229小时，同时累计技改创新110项，发动机试验室综合能力建设项目也被评为“东风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苏东坡说过：“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如果说意志、毅力、恒心与能吃苦是我志益弥坚的关键所在，那么，良好的心态、先进的科研理念则是我成功的基础。

成长是一个和困难死磕的过程。一次，东风汽车公司在自主开发的首款发动机A16研发过程中，在即将完成20多天的可靠性试验时，突然发现发动机机油压力低问题，经过一天的排查，依然没有找到原因，这意味着要重新做一轮可靠性评估试验。重新试验，必将影响到发动机整车试装进展，进而影响整车开发进度，延误东风汽车公司自主品牌汽车的上市。怎么办？问题一直持续到当天晚上9点多仍未被解决，许多人想放弃，我却凭着自己的经验，十分自信地说：“大家先不要着急，让我再查一查吧。”两个多小时的现场确认检查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此时，一直自信的我也有点动摇了。

“心态，心态，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我站在操作间看着试验间内汽车的“心脏”——发动机，心里不停地告诫着自己。很快，我冷静了下来，重新对发动机运行条件进行逐项检测，试验工况、核实零件的安装状态……最终我发现原来问题并不是出在发动机上，而是试验小车机油泵出现故障，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运转。第二天凌晨2点，经过维修，台架终于恢复正常，重新开始运转试验。

尽管已是凌晨，但因为攻克难关而兴奋的年轻技师们全无困意。借着这股劲，我在现场给他们详细讲解试验小车机油泵的部件原理，并告诉他们组装完成后应如何检查各部件是否正常工作，同时也告诉他们在遇到问题时，要努力尝试解决方法，不可轻言放弃。

2010年11月的一天，东风汽车公司新开发的发动机首台样机装配，由我和德国保时捷的专家负责共同完成。德国专家在装配发动机的活塞、活塞环时，第一道及第二道活塞环装反，我发现后立刻质疑，直言不讳地指了出来。周围有人说：“这是保时捷专家，不会错吧？”“发动机的第一道活塞环是气环，也就是矩形环，耐温耐压；第二道活塞环是梯形环，刮油部油。这两道活塞环装反，会影响发动机……”我与德国专家交流沟通后，德国专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我致歉，并当场向我竖起大拇指。

打造精英团队

一款产品能否顺利投产，试验验证是关键。作为试验运行组的负责人，我深感责任重大，不仅要保证试验的顺利进行，还要帮助年轻的技师们更快更好地掌握试验技能。为此，我组织开设专业理论课堂，并将废旧发动机利用起来，进行发动机拆解，提高年轻技师对发动机结构的认识；组织大家研读和完善发动机试验流程，指导编制各种操作规范，并实施台架看板目视化，使得工



2017年11月，杨军（右）在指导维修、安装测试设备

作有据可循，提高工作效率；广泛开展岗位技能比武练兵，针对组员不同的技能水平，建设梯队式队伍；激励和关心青年员工，开展日例会、周总结交流、月改进、“5S”管理方法等学习活动，凝聚和提升团队的各项能力。

目前，团队建设已初显成效。我所带的试验团队连续5年获得公司级“工人先锋号”称号，2014年荣获国家级“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2017年荣获“中央企业青年文明号”；团队中多人在湖北省职业技能大赛中崭露头角，1人获湖北省“青年岗位能手”，多人获东风公司技术中心“优秀员工”荣誉称号；2017年荣获“东风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2019年公司创建了“杨军发动机试验工+技能大师工作室”。近年来，团队的自主创新研发也获得了一系列成果。如“乘用车发动机综合试验能力建设”在2013年获东风汽车公司科学进步二等奖，完成性能台架试验台时7200小时，节约试验成本1440万元；完成可靠性试验约50项，按照各类别试验费用分别计算，节约试验

成本 1300 余万元；完成整车转毂试验 1000 余项，节约试验成本 968 万元，共计节约试验成本 3708 万元。再比如“东风自主品牌 e-TECO-A16 汽油发动机开发”在 2014 年获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科技进步特等奖。东风 e-TECO-A16 汽油发动机自 2012 年 11 月搭载风神 S30 投放市场，截至 2014 年 3 月，累计整车销售 14832 辆（其中出口 220 辆），整车新增产值 118656 万元，其中发动机贡献利润 2310.8 万元（其中 TUS 发动机相比每台节省成本 1558 元）。工作室还组建了技术服务团队，首创驻店服务模式，实现问题处置快速反应机制，支持服务乘用车现生产援助及市场，现场技术援助+远程技术指导 85 次，挽回发动机 31 台，约合挽回 80 万元的经济损失。

这样一支战斗力强的青年试验团队，在我的带领下，用激情燃烧的青春，为东风汽车公司“自主品牌”的旗帜添上了一抹耀眼的色彩。

未来的展望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武汉成为风暴眼。我第一时间向社区和“学习强国”的武汉防疫志愿服务平台报名参加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考虑到小区里的老人较多，他们行动不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我积极参加社区组建的团购群为居民采购、配送所需的蔬菜、水果、药品和生活物资，还先后参加了武汉市汉南区红十字会捐款、十堰市太和医院捐款赠口罩、东风公司劳模群捐款等爱心捐助活动，用实际行动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尽一份绵薄之力。

我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各种无接触场景中，无人配送车 24 小时

不间断为医院、隔离点、小区等配送医疗和生活物资，提供消杀服务，不但配送效率高，而且保证“物流人不流”，防止了交叉感染，为科技战疫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使我陷入了思考。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 5G 网络、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为无人配送车辆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在此前景下，东风提出了向“为用户提供全方位优质汽车产品和服务的卓越企业”转型，目前已初具雏形，在 5G 技术、网络技术赋能下，转型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时代也给我们这些汽车产业技术工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勤学苦练，锻造过硬素质；保持职业定力，把学习技能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关注行业、产业的前沿知识和技术进展，不断提高核心技能水平，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下一步，我将利用杨军劳模创新工作室打造创新平台，助力自主研发事业，用岗位练兵强技能，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推行梯队建设机制，建立“传帮带”制度，引领团队成员在工作中多角度观察和评价，创新、专利想法行动化，建设东风自主品牌汽车研发的一流团队。

创业、创新、坚韧、精益，是东风人“马灯精神”的核心，也是我长久以来秉持的工作态度。工于技、匠于心，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坚守一线工作岗位，为东风自主品牌的发展，为大武汉的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杨军：东风公司技术中心首席工种师）

王道俊：投身主体教育的教育学家

◇ 董中锋

2013年是华中师范大学建校110周年。为迎接校庆，学校出版社准备推出系列图书，其中就包括我撰写的《华大精神与人文底蕴——学人·学术·学养》一书。因为撰写该书，我便与王道俊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该书写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上的一些名家大师，选哪些人，当然需要一定的标准，我也自定了一些标准。在我的心目中，王道俊先生自然是位列其中的。

在写王道俊先生之前，我先做了一番功课，查阅了相关资料和研究文章，目的是增加对王道俊先生学术贡献的认识和了解。实际上，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30多年，对王道俊先生还是有所了解的。记得王先霈老师曾跟我说：“王道俊老师的心态真好，他那么有威望的人还住那样的房子，他的学生都比他住的好，可他一点都不在乎！”

王先霈老师也是德高望重之人，往往一言九鼎，说到王道俊先生，却是心怀敬意。

我所了解的王道俊先生，首先是他主编的《教育学》教材。1980年，王道俊先生领衔主编的高校教材《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满足了我国师范院校教育学的教学需要，促进了我国教育科学的普及和发展，一版再版，累计发行数百万册，创造了中国教育学教材史上的一大奇迹，是教育学本土化的典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典教育学教材。

再就是王道俊先生的主体教育思想。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在我国教育领域萌发。它集中体现在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这一命题上，主张要改变学生的地位与现状，真正调动和发挥学生在教育与教学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改进和调整师生关系。王

王道俊先生针对传统教育理论和我国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忽视学生和教育的主体性的弊病，提出了主体教育论的教育思想，并开展研究，试图从肯定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人在自身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探讨和阐明教育的主体性，以便充分发挥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的积极的能动作用。他和郭文安教授发表了《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的论文，不仅对学生主体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还对学生主体性的表现和实现条件进行了系统阐述。自此，教育理论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理论研究之外，王道俊先生还将主体教育思想贯穿于教学之中，也贯穿于《教育学》教材之中，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深受师生爱戴和尊敬。他情深意重，坚强睿智，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他治学严谨，谦虚低调，淡薄名利，为人、为学、为事都成为学生学习的标杆。

初稿完成后，2013年7月22日，我打电话给王道俊先生，想请他看看文稿，提提意见。电话中，王道俊先生说话中气十足，非常客气。但他说：“不值得写！写我就冤枉了！”在我的请求下，他最终还是把邮箱告诉了我，我随即将文稿发了过去。

过了一天，7月24日下午，我又打电话给王道俊先生，问稿子情况，王道俊先生说：“文稿看了两遍，评价太高，怕别人说。”我解释说，文稿是我写的，只代表我的看法。王先生似乎也认可，于是便给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求学经历。根据他的介绍，我便将他的简历整理成这样的文字：“王道俊，1926年出生，湖北大悟人。幼读私塾三年。1937年入半年短期小学学习，后上汉口市第36小学，再进湖北省联合中学高级商业分校附属初中。1942年初中毕业后进入湖北省第

七师范学校学习，1945年毕业。从1946年开始先后到湖北秭归县简易师范学校、礼山县（今大悟县）第一初级中学、汉阳文德小学任教。1949年进入中原大学46队学习，同年底读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1951年到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室读研究生，1952年随院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53年研究生毕业，随后任教于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年任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1992年离休。”

7月29日上午，武汉仍是晴热天气，我又打电话给王道俊先生，想听听他对文稿的意见。这次，王道俊先生终于肯谈文稿了，因为他原以为我是奉学校之命来写他的，所以不愿意多说，而在知道了我是个人所为，是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以后，王先生表示“敬佩”。于是，他指出了文稿中四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意见。

第一，不赞成《教育学》是“推倒重来”，反对提“推倒重来”。他认为，对学术的发展来说，不存在“推倒重来”。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没有“推倒重来”，是吸取、借鉴。王道俊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原稿中引用了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话。那段话是这样的：“王道俊的《教育学》可以看作是教育学‘推倒重来’的成功典范。而一旦这种‘推倒重来’获得成功，它也就宣告并确立起中国当代教育学的基本阐释范式和解释体系，由此而影响中国教育学教材建设三十年。”（《教育学本土化努力与解释体系的确立——王道俊主编〈教育学〉（1980年版）及其历史镜像》）

第二，删除“国内率先提出”。王道俊先生说：“有人说主体性首先是顾明远说的，实际上顾明远自己都说是从苏联那里学



2013年8月1日，王道俊先生和夫人汤荣珍于书房合影

的。如果从教育思想来说，应该是我先提的，但我不想去争这个谁先谁后的问题。这是我跟你说的真实想法。”王道俊先生是针对原稿中“国内率先提出了主体教育论的教育思想”这句而言的。

第三，“我很矛盾，既不愿意你写，同时又帮你找点材料，以求丰富一点，不然太单薄。”原稿中，我列举了王道俊先生发表的系列论文，即《试论教育的主体性》《关于主体教育思想的思考》《关于教育的主体性问题》《关于教育主体性问题的几点认识》《主体教育论的若干构想》等，而没有把《知识的教育价值及其实现方式问题初探》一文列入进去。王道俊先生告诉我，《知识的教育价值及其实现方式问题初探》是近一点的，比之前的要完善，谈的是主体教育思想。在列举学术职务时，原稿只列举了王道俊先生“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研究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王道俊先生说，职务可加“湖北省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研究会理事长，湖北省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列举获奖项目时，原稿只列举了王道俊先生“曾获‘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二等奖，吴玉章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国家级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优秀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王道俊先生告诉我，奖项可加“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

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四，“招研究生时，我没有在研究生招生会议上拍桌子。”王道俊先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原稿写了这样一件事：1990年，有一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的中学老师报考教育系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成绩第一名，但外语成绩不及格，录取受阻。王道俊先生并不认识这位考生，见这位考生非常优秀，且有培养潜力，他拍着桌子说：“如果这个学生不招，其他的学生我都不招了。”最终那个学生被学校作为有突出成绩的优秀在职人员破格录取。这位学生不负所望，毕业后成了颇有建树的研究员。王先生告诉我：

“说我拍桌子，这是误传。实际是那个学生外语37分，其他都不错，是教语文的，已发表了一些文章。我说过这个话：‘如果这个学生不招，其他的学生我都不招了。’这样报到了学校研究生处，据说邓宗琦副校长亲自到省招办争取特招，但邓校长没有跟我提起过。”

后来，我根据王道俊先生的意见，对文稿一一作了修改。

根据图书要求，每位入选学人要配两张照片，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谋到了一张王道俊先生的照片，那是在书房照的，但年代不详，看样子是中年时期。于是，我又找王先生，希望到他家里拍一张近照，以与另一张照片有所区别。8月1日上午，天气依然炎热，我拿了一个数码相机，来到桂子山北区王道俊先生家里。王先生很热情，马上引我到书房，我一看，有点愣住了，因为书房的场景和之前那张照片上的差不多，书架像是原来的，书桌仍旧古朴，就是王先生坐的位子和角度也区别不大，只是王先生脸上的皱纹多了许多，头发和眉毛变得花白。也许是见我有些迟疑，王先生的夫人问我她可否参加，我觉得更好。这样，就拍了一张王先生和夫人的合影。

2017年6月24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孙民从教授到我办公室，他说，这两天很累，因为王道俊先生前天（22日）晚上去世，今天告别，外地有两三百人自发赶来悼念，需要人帮忙，所以自己就到王先生家里帮忙接待。说起王道俊先生，孙教授肃然起敬，他很沉重地说：“我是从内心里尊敬王老师。我不是王老师的学生，是王老师把我留下来的，但王老师从来不跟我说。王老师是真正的德高望重啊！”说时，孙教授眼中噙着泪水。

就在去世的前几天，91岁高龄的王道俊先生还在修改新版《教育学》。在数10页的“修改意见”前，王先生写了这样一段话：“年龄也令我不能同教材分手。但在剩余的日子里，如有可能，仍将继续点点滴滴地记下修改意见，算作是隔世告别。其实，我不与教材告别，教材也会与我告别……”

王先生是真正地把学术融入到了生命之中。

王道俊先生说：“主体教育理论作为一个词汇也许会消失，但有关的话题将常说常新，因为教育引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仍将越来越凸显，实现建构体现时代精神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的愿望也将越来越迫切。”是的，就像王道俊先生一样，早年他和郭文安教授就提出了“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的命题，到晚年还提出要“把活动概念引入教育学”。这种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和他的学术、学品一道，将受惠于一代一代的学子，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进动力。

（董中锋：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中南民大：我心中的图腾

◇ 彭英明

按人类学视角的理解，图腾，就是一种记忆、一种崇拜、一种期许。我是一个出生在武陵山区湘西的土家族子弟，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长期学习、工作和生活在我的母校——中南民族大学，除中间10年外，至今已有50多个年头，也算是名副其实的“民大老人”了。因此，将民大称之为心中的图腾，那是再恰当不过的。

时光任苒，沧桑巨变。中南民族大学经历了从初建、撤销、复办、发展的历史过程。循着学校曲折发展的历史步伐，回忆一下自己在这个民族大家庭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些故事，并展望她的未来，幸许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初入民院

沿着武昌蛇山往东延伸，有一个不高的小山头，人称小洪山。山上，宝塔高耸，青松翠柏，古寺庙掩立。山下，街道旁边，屹立着一座碧瓦白玉的礼堂和一排排整齐的楼房，这便是建国初设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她就是今日中南民族大学的前身。我的大学学习时代和教学工作之初，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土家族贫苦家庭出身的我，新中国成立前根本无法上学读书。1950年10月湘西解放，家乡办起了小学，已经10岁多的我，

才背上书包，开始启蒙读书。到1956年7月高小毕业，因水灾无钱上初中，我又失学了。这年10月，听说湖北文化干校在鄂西招收学员，做电影放映员，我便背上一床母亲编织的“西兰卡普”破被，跟随盐商马帮，行走300多里山路，到了鄂西咸丰县城。经考核，我因个子矮小，不能入校，被吸收到县人委会，当了一名勤务员，做送水跑腿的事。后来，因我爱读书，人还机灵，便学着打字、油印，才成了一名机关打字员（旧式打字机）。因为有了这一机遇，我便抓紧学习，一面工作，一面进县干部业余学校读书，几年时间，竟修完了从初中到高中的全部文科课程。到了1960年，国家号召工农干部考大学，我便动了心思，申请参加全国高考，县领导以“试试看”的态度竟批准了我的申请。依赖于党的民族政策和“工农干部”身份，加上日夜苦读强记，因不考数理化外，只考政语史地，我竟然被正式录取了。就这样，1960年9月，我怀着极其兴奋而又胆怯的心情，进入位于小洪山下的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后改为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60级2班学习，从而实现了我的读书梦、大学梦。

9月初的某一天，我一个人身背行李，不辞舟车劳顿，翻山越岭，乘船过江，经几个日夜，平生首次来到大武汉，走进美丽的校园，心之激动，难以言表。那宽阔的学校大门上闪烁着“中国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的毛主席题字，那宏伟的宫殿式的大礼堂建筑，那掩隐在松林中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无处不是诱人醉人之所。隆重的开学典礼上，倾听白瑞西院长的深谋预言，严学窘教授兼副院长的谆谆勉语，好不为之感动。开学典礼之后，则是系里的师生见面会。在一个简陋的食堂餐厅里，由老系主任贾青

波同志讲述了建系历史和专业特点，并一一介绍各位教授师长。老师们个个慈目善眉，满脸堆笑，使我这个自幼离家，少得亲情的远方游子，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亲切。会面之后，由主管副书记召集班会，成立组织，近百位八方各族学子，聚集在一起，组合成一个互学互帮、日夜相融的小族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的民族学院，党和国家为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还特别实行了学费和生活费全免的照顾政策，不仅管吃，还补发衣被，每月还有零花钱。而对于我，作为少数民族调干生，除享受一般照顾外，每月还要多发8元生活补助费。这正好弥补了我当时因家庭特困而毫无外援的困境，每月还可节省点钱，积累起来定期汇往家里救急。在这个世界上，有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行这样优越的民族政策。我能不迎难而上发奋学习吗？我能不争取优秀的学习成绩报答党恩吗？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要辜负党和民族的期望。

困难，但快乐着

我的大学时代——1960年至1964年，正碰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极其困难时期。对于我个人而言，还具有特殊的困苦，一则因父亡母病两妹幼，家庭面临绝境，毫无上学的经济来源；二则自己原来学历太低，基础差，开始专业学习深感吃力。但是，就在这种双重困难的逆境中，我并未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吃力但努力，困难但快乐着，勇敢地走了过来。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伟大的党和人民并未被困难所压倒，而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民族学院也经历了这样的努力过程。当

时，学校在院党委的具体领导下，兴办了南湖农场，种稻种薯，养牛养鱼，我们做学生的，每年都要轮流劳动一月，风餐露宿，战寒斗暑，挖地锄草，割麦收谷，不知流下了多少汗水，换来了一些收成。我们还利用校内洼地，养过“小球藻”，以增加营养。各个学生班组还在校园空地上，见缝插针地种了许多蔬菜，几乎每天课余时间都轮流去浇水施肥，以补国家供应之不足。记得一次夜半，我们有几个同学实在饥饿难忍，便悄悄起床摘了菜叶，用脸盆作锅，在野外生火煮了便吃，填饱空肚，欢闹嬉戏，也是困难而快乐着。这可算是我们当年大学生活的一段小插曲吧。

不仅如此，对于我这个家庭极端困难的“调干生”来说，必须面对的就是还得济家。当时我的父亲因灾而亡，母亲病弱力单，两个妹妹尚未成年，家里已十分贫穷，不仅不能予我以助学，而且还希望不时能得到我的接济。于是，我只得每月在学校所发的8元调干助学金中挤出5元，寄回家中，救济度日。所以四年的求学生涯中，我不仅没有回过一次家，每到寒暑假，还得到农场帮工割草喂牛，赚点小钱。我还经常与一些穷同学一起，到车站码头当搬运小工，也小有收益。这里，还特别值得提及的一件事，是学校对我的一次又一次的特殊帮助。记得1961、1962年两年年底，家里实在熬不下去了，要我辍学返乡。校方领导得知后，两次额外给我困难补助各20元，让我寄回家中，不仅拯救了我的家庭，也拯救了我的学业。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以外，对于我，还有一个难处就是专业学习上的先天不足。因为我未上过正规中学，故外语和古汉语的基础较为薄弱。外语好办，因当时都是俄语初

学，我就利用一切时间，勤学苦读，在老师的辛勤教导下，还能跟上，经过三年学习，还算优良。古汉语乃学历史之必需，于是我只得特殊请教，勤读强记，日积月累，在古籍老师悉心教导下，也取得了久久为功的效果。记得到三年级时，我已读过多本历史史籍，“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包括近代史籍，我都有所涉猎。这就为我后来从事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史、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奠定了较厚的基础。

师恩难忘

今常道：学校的主体是学生，然传道授业之人，则离不开教师。我们学校建于新中国成立后，教师队伍水平尚需提高，缺乏大师，但能担当授业传道者还是有的，且有一二学有所长的大师级教授。

我们是民族院校历史专业，首先需要提及的自然就是民族史和民族学课程，其教师主要是著名的民族史及民族学专家岑家梧教授，还有容观瓊、刘孝瑜先生。民族理论政策教师则是蔡仲淑老师及程佳庸女士。中国历史，从古代到近代，依次主要由冯来仪、吕名中、张富康、韩荣宝、朱秀武等老师讲授。现代史主要讲党史，由张雄等老师授课。世界历史方面，系杨朴羽、陈士元、秦仲藩诸师主讲。此外，尚有俄语、中国语文、哲学、政治经济学及体育诸门课程，教师甚多，因记忆所限，难一一提及。

在这里，特别需要忆仰的是我校大师级的著名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对我的特别栽培和师恩。他于1953年后到中南民族学院任教，为我们教授《民族学与原始社会史》《考古学》和《中国民族史课程》，极为认真负责，对我的教诲帮助尤大。一是当我遇

到双重困难之时，他鼓励我树立信心，坚定了我生活和学习的勇气，终于完成了四年学业。二是不仅具体辅导我学好了各门课程，而且指导我初步进入了民族学研究领域，发表了民族专业研究的处女作，奠定了后来我终身从业的基础。为感谢他的辛劳，当年毕业前夕，我还用微薄的打工收入买了两瓶酒，作为酬谢送给先生。可惜的是，先生在“文革”中不幸去世，使我校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受到了巨大损失。

除岑先生之外，在我读书期间，引领我走上学术道路的，还要感谢后来曾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牙含章先生。牙老当年提出的“从部落到民族”的新理论，影响了当年的学术界，也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我的处女作正是接过他的公式而做的。后来，牙老当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会长，仍常年与我保持联系并指导，如今他已驾鹤西去。

还有一位知名学者，虽是同事，更是导师，虽未直接授课，但予我学术帮助极大，这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权威章开沅先生。民院撤销十年，我去了桂子山上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跟随先生学习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深得章先生悉心教诲，参与编写辛亥革命专著，不仅初入学门，且小有成就，皆因先生指导。现今先生已九十高龄，鹤发童颜，我诚祝先生健康长寿，百岁再长。

学有所获

日月如梭，寒去暑来，四年的大学生生活终成过去。1964年7月，我们终于按计划修完了历史专业各门课程，届满毕业。莘莘学子，欢呼雀跃，心中好不欢喜。展望前



著名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

程，所获虽有不足，但仍觉进了一步。

首先，是德行的修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比前更加明确。其次，是知识的积累和教学科研能力得以初步入门。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高校文科的学生，光有书本知识和研究能力还是不够的，应该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体验社会，锻炼自己，培养自己的社会管理能力。1964年8月，我们刚留校不久，便由省里安排，与兄弟院校留校学生一起，身背行李，进入孝感白沙穷苦农村，与农民一起挑谷割草，百斤担肩，挥汗炎日，确实累不堪言，但终于磨炼了身体，考验了意志。半年后转入“四清”，深入贫下中农家庭，实行“三同”，要管理社会，组织生产，做群众工作，还要妥贴担负起几百人的吃喝拉撒，虽初不适应，但几经学习，也能应对。

1970年，中南民院被撤销，当年10月，我去了桂子山上的华中师范学院，开始了为时十年的离开母校的日子，直到1980年年初，中南民族学院恢复重建，方才回归。

复办之始

“双塔耸立仰蓝天白云，两屋落成望青山绿水。”这是我在老年大学所写的一幅对联习作。双塔系我校图书馆两座高楼，为学校标志性建筑；两屋则是指我校两座博物馆馆舍，原只一栋，另栋新落成，灰墙碧瓦，大盖屋顶，尤具民族特色。两馆之建成使用，致新民大享誉中外。作为新民大复办参与者和教学管理工作之一，我在这个新建的美丽校园又度过了35个春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进程。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作出了恢复重建中南民族学院的正确决定。

但是，真要恢复起来，则困难重重。首先，是在哪里重建，老民院在武昌小洪山下的街道口，已被省军区占用多年，校园校舍早已面目全非，已不适宜原址办学，而且面积也小，不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另选新址。最先确定了五处地方供选：一是原南湖机场边，但噪音太大；二是汉口以北一边远地，不是文化之区；三是东湖梨园附近，需搬动武钢变电站房，影响生产；四是马鞍山下，湖泛风大，均不能令人满意；第五就是现在这块地方，叫向家山石板头。

这个地方当时也是偏僻荒凉，水、电、路均不通，在小山的周围，散落着一些农田、

湿地和稀疏的林木，垃圾遍布，污水横流，好不凄然。记得当时国家民委一老领导在省市干部陪同下，只能乘车来到现在的洪山高中（当时是荣军疗养院）下来远望，只看到东山头的采石场处裂石堆积，风沙飞扬，便再也不愿跨过田坎：“要少数民族学生到这里求学，怎么体现对少数民族的平等关心！”确实令当时陪同人员深有同感，大家也很不满意。

然而，学校还是要复办，地址也别无选择，只能定在这里。记得一天晚上，白瑞西院长亲自出面，召集大家开会，统一认识。白老诚恳地告诉大家：“要看远一点，现在形势变化很快。只要党和国家重视，情况会一步步好起来的。这里面临南湖，有山有水，风景优美，经过建设，将来一定是块办学宝地。”现在看来白院长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老革命。

紧接着，就组织人马，兵分两路，一边搞基建，一边筹备教学。我是1980年3月初到民院复办处报到的，被分在教学筹备组。当时办公地点设在湖北二招所，开始没有多少业务工作，就经常乘车到新址基建工地来参加义务劳动，挖地、挑土、种树，什么都干。因为未通路，车只能到荣军疗养院，我走过田坎，到石板头现校门处，领了工具再到山上劳动。吃的是简易茅棚食堂做的饭，喝的是池塘里的死水，因当时未受污染，倒也干净。劳动累了，就躺在山上草丛中休息，或下南湖冲洗，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这样，看着工人们修通了从鲁巷进来的道路和水管，架好了电线，半年“三通”后，开始建房。

1980年5月，为了准备招生办学，我即与陈耀坤、陈曼蓉等在杨清栋副院长的带领下，去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调查，收集基层

意见。我们一行先后下到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再进入鄂西参加了来凤、鹤峰土族自治县成立大会并进行调研。一路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察看到民族工作的大好形势，心中好不兴奋。至7月初，我们回到武汉，开始教学准备。

教学·科研·苗乡实习

经过一段基本建设和教学筹备以后，从1981年暑期开始，学校招收新生。办学条件虽然简陋，然师生热情却极高。对于华师十年，我仍然十分怀念。尤其跟随章开沅先生学习中国近代历史，且已开始入门，不仅参与撰写了大部头的《辛亥革命史》，而且还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若干文章，尤其那篇《论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上了《新华文摘》，在全国学界已初露锋芒，丢了实在可惜。章师也劝我不用返回民院，在华师前景看好。但我是一位少数民族子弟，在民院成长，没有理由不回来服务。所以，受白老感召，我义无反顾地重新走上了民族高教岗位。

我回院后当然就是重操旧业，到政治系当教师，主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因为有大学时代对民族方面学业的爱好，故在程佳庸、杨拯等前辈的帮助下，我很快就适应了专业，而且还算得心应手，教学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其经验还被登载在省教育厅主编的经验介绍上。记得在讲“民族形成和发展”一章时，我即利用了学生时期的研究成果，又结合我在历史课程中学过的关于汉民族、蒙古民族、藏民族以及土家族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典型，讲得也算生动深刻，得到学子们赞扬。我曾宣布，在

课堂上可以讨论，不愿听也可退场，但却无人出走。就这样，连续多年，我初步积累了理论和知识。到1987年，由我连续主编的两本适应不同专业需要的教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和《新编中国民族理论教程》先后正式出版，得到了民族理论教学界的肯定，并在《光明日报》报道，多年都被较为广泛使用着。这就是我那6年教学工作的结晶，作为教师出身的我，现在都为自己当年的努力而高兴。

最为得意的是，复办之初，为了能给民院在学界争一席之地，我竟然不顾当时刚刚入门，正处学步之状况，也敢于上阵，与大家探寻学术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民族问题实质”学术讨论正盛，在全国第一届民族理论学术会上，我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提交了一篇《民族问题及其实质浅论》的文章，被发表在《民族研究》上。面对民族地区的现实需要，当时我大胆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问题概念”的新观点，引起了整个学界的极大震动。这一新提法，抛弃了过去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所定的旧民族问题概念框框，其中一些提法后来被党中央高层的讲话采用，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共识，也算是自己对民族理论的一点小贡献吧！在那几年，我曾利用专门从事教学之机，系统地探讨了许多民族理论问题，撰写了40多篇创新性的系列论文，有的还被《中国社会科学》等高级别刊物所登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我比较早开始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适应了新时期民族理论的新需要，受到了国家民委和学术界好评。

还有一件事也很值得回味，就是我第一次带领复办后的首届81级学生深入到湘西苗乡凤凰县的教学实习，也比较成功。那

是1984年秋81级学生毕业前，在他们学习了民族学等理论课程以后，为了检验学习成果，在我刚刚担任政治系副主任不久，即与几位老师一起，带领81级的50多位同学，来到了中部地区保留民族特色最多的苗乡湘西腊尔山地区开展教学实践活动。先是在县城为中学授课，以检验组织、语言、管理能力，深受欢迎。我们还与县直机关开展篮球比赛，战遍县直机关球队，包括联队也毫无对手，深得赞扬，为复办后的学校争了光。因为表现突出，县里尤其特殊照顾，住进当时接待条件较好的县招待所，饮食丰盛，同学们好不高兴。后来，师生们怀着好奇的心情，下到称之为“三江”（苗语巴库）的苗乡作民族调查。这里山清水秀、民风纯朴，但生活条件极差，吃包谷糙饭，无油盐菜，喝泥塘水，睡稻草大通铺，蚊虫叮咬，跳蚤乱爬，苦不堪言。但师生们忍受一切困难，走村串户，收集经济社会民俗资料。经过调查，积累了近百万字的资料，整理带回学校。

勇挑重担

好梦逢时节，送我勇担当。停办十年分散各地的民院人，一旦重新聚集，便都投入工作之中。我也在家庭尤其爱人王静的大力支持下，抛开一切家务、家事，以追日赶月的精神，全力投入了民族教育的事业中。从1980年到1988年，我不仅承担了教学、科研任务，而且配合湖北省的民族工作，为社会服务。与此同时，在学校党政领导支持下，还以双肩挑的形式，担负了政治系副主任、主任的工作。由于与已故的周存诚教授以及黄忠臣同志、张晓武教授团结协作，工作十分顺利，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了鼓励我，先后将我评为省科教战线先进党

员和劳动模范。1988年，我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民委委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以及民委学术委员。这些荣誉的获得应该归功于各级党组织的精心培养，归功于党的民族政策。

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对我的培养和锻炼，从1988年秋开始，更将我推举到学校的行政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了学院副院长和院长职务。这一重担的托付，当时确使我深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了不辜负党的培养，不辜负少数民族群众的期望，不辜负师生员工的信任，我只能一往直前，勇挑重担。

我一到学校领导岗位，开始主要分管教学工作。记得在我分管教学的1988~1994年间，我重点抓住这样几个环节：一是抓系统扎实的课堂教学，着力教研室建设，集体备课，教师相互帮教，试讲后方上讲台，每年组织教学比赛，树立典型，学习先进，大家提高很快，保证了课堂教学质量；二是加强教学实践环节，理科实验动手，文科必须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经费再难也坚持了下来；三是大力进行专业改造，坚守老专业，建设新专业，由原老民院只有几个专业，发展到50多个专业（现已达80多个），走在了全国民族院校前列，从而为扩大招生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4年7月，为加强学校管理，锻炼我的全面管理能力，组织上又赋予了我行政主要领导的职务，这使我更加感到诚惶诚恐，压力山大。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所拨经费不多，很难适应发展需要。于是，我们只能挖掘潜力，节省开支。好在全院上下一致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也基本保证了运转。很多事情，包括改善住房条件等，还得到了推进，受到了大家赞扬，这是我至今都感到十分欣慰的事。

民族教育要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为民族地区服务，这应该是兴办民族学院的始终方向。我还感到欣慰的是，20世纪90年代，我又参加了几次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民族调查，两次都是与段超教授一起，参加省民委组织的松滋县卸甲坪土家族调查和神农架下谷坪土家族调查，为两个地方建立民族乡奠定了基础。在卸甲坪，我们沿河探寻搜集古物，证实了古深溪土司的扩疆；在下谷坪，我们翻越神农顶，行走悬崖，摸清了当地群众与容美土司的连接。资料之真实，为前所未有的，受到群众欢迎和领导赞赏。除此以外，我们还应邀去了湖南石门，参加了当地的民族考察，为当地土家族群众恢复民族身份作了一些努力。

还值得忆及的是，我到院工作以后，并未因此而脱离科研，基本坚持了“三肩挑”，集教学、服务、研究于一身，也是有收获的。在此期间，我被选为全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完成了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出版了《邓小平民族理论研究》一书，并参编国家民委统编教材，承担了主要章节的写作。我还担任了湘鄂渝黔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职务，并与段超教授一起，主持了12本土家族问题丛书的撰写出版，在学界影响也较大。

金秋晚霞

2001年，我虽已年届六旬，但因仍担任武汉市人大常委，按规定未办退休，便积极参加到市里的民族工作中去，曾被评为武汉市统战民族工作先进个人。

在校内，因仍在职，我当然也不能脱离教学科研。那几年，我先后带了两届“民族理论”研究生，给民族学博士生授课，有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政策》《中国原始民族文化专题讲座》和《土家族文化志》等课程。与此同时，结合形势发展，先后配合宣传两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发表了《论新世纪民族问题与民族自身发展》《新时期新阶段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纲领性文献》等文章，并出版了《土家族文化志新编》一书，致使我的民族研究工作未有停顿。

2006年，在延期五年之后，我终于退休了。本以为无官一身轻了，却又被推到了学校老年协会会长和省高校老年协会副会长的岗位上，做了一些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时日不留情，岁月催人老，不知不觉我早已进入古稀之年。在中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大家庭里，我也已经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热爱我们这个美丽温暖幸福的大家庭。天高云淡，湖水翻波，群楼耸立，绿道伸展，当我信步在几万青春学子之旁悠闲自得时，我陶醉了，陶醉在无限的遐思之中……中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我心中的图腾，我的崇拜，我的记忆，我的远望！您一定会更美好，祝福您！

（彭英明：原中南民族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写于2016年）

我在光谷的三次身份转变

◇ 金 婵

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除了海外留学的那几年，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武汉。留学归来之后参加工作，无论是在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尽管角色几经转换，但基本上扎根在东湖高新区，见证了十几年来高新区的飞速发展，也有幸参与其中，为光谷腾飞贡献了一份力量。

第一次转变：从“海归”到外企职员

1999年，我孤身一人来到海外求学，直到2004年学成回国。回国之后的我面临着好几个选择：到位于光谷的一所国际学校应聘过，也有一家酒店邀请我去担任法方总经理助理，最终我选择去了武汉萨基姆天喻电子有限公司担任法方总经理助理。

我到公司报到的时候，整个公司加上

我一共也才三个人：法方经理、中方负责人和我。为了让公司快速走上正轨，能按照公司北京总部的计划按时投产，当时的我一边忙着装修厂房，一边跑政府部门办理公司的各种证照和法方专家到武汉的各种报到手续。因为我们是芯片电子企业，法方对厂房装修的要求很高，时间也很紧，当时为了能找到符合要求的工程装修企业费了不少功夫。除了与装修企业协调对接，我还要负责翻译合同。装修期间，正好遇上春节，装修工人都要放假回乡，但是又不能延误工期。我不停地协调装修企业，合理安排工期，保证装修工程按时完工。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人员招聘。为了招到合适的人才，我们在《长江日报》刊登了一整版的招聘广告，据我了解，不少那时候招聘的人才，至今仍

在为公司服务。从公司筹备建立到投入生产运营，我全身心地积极参与，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复杂问题，公司终于正常运转。

初次工作取得了成绩，我的心中涌起说不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那时候公司初创，我主要负责与法方派驻公司的总经理和专家对

接。因为是外资企业，很多企业的手续都需要去汉口办理，不像现在有政务中心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方便很多。每次去办事，我都是坐公交车到汉口。因为懂法语，又是武汉本地人，我还要负责照顾法方专家的生活，和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对接，办理相应的手续，这也为我后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公司的那段时间，我的职务虽然是总经理助理，但还要兼秘书、翻译等工作，强度很大。那时候，武汉光谷正处于发展初期，入驻的外资企业并不多，当时省里的领导很重视光纤、电子产业发展。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正是芯片。因此有很多领导来公司考察调研，包括法国总领事，省、市、区领导，那些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现场担任翻译。我记得有一次时任湖北省省长罗清泉来公司考察，正是由我担任现场翻译，当时罗省长对我说，你一定要跟法方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翻译这句话：“希望你们把你们的核心技术引进到中国来。”平时，我还要把董事会的决议翻译成中文，每天的常态就是提着一个放着一本厚字典的大提包，以便遇到不太清



2014年3月，金婵（右一）在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处理日常接警

楚的单词可以随时查看。外企工作讲效率、节奏快，但我还是比较适应的，这可能与我的留学经历有关。

刚到法国的前半年，我只能讲英语，因为我是英语专业出身。但是在法国，当地人不愿意跟你说英语。我迅速调整心态，苦攻法语，半年之后，就可以用法语记笔记了。法国的大学都是宽进严出，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线，进大学并不难，但是想要顺利毕业，却不是那么容易。拿我所学专业的考试来说，一本几十页的试卷发下来，考试时间6个小时，不是单纯的做题考试，而是会模拟企业里的一个状况，通过这个状况考核学生对市场分析、会计、逻辑等知识的掌握程度。我所就读的学校只有我一个中国留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同一批出国留学的人里我是最早毕业回国的。不仅如此，一个人在异国生活，一开始我也害怕过、彷徨过，每天很早就要出门去上课，有时候连搬家都找不到帮手，只能自己打包一点点地搬，即使这样，我仍然咬牙坚持着。

有了国外的这段留学经历，后来无论是在外企工作，还是进入政府部门到基层一

线服务群众，工作条件可能艰苦一点，但和身在异国他乡的那种孤独感比起来，要踏实很多。每天回到家，可以见到父母，见到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吃到可口的饭菜，即使在外面碰到一点苦，我觉得也不算什么。我经常对孩子们说，你们要珍惜现在这种每天都可以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角色转变——从一个“海归”到外企职员。

第二次转变：从外企到政府部门

2010年，武汉东湖高新区面向社会招聘人才，我通过招聘考试加入到城管队伍中，成为了一名服务企业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刚到单位，领导就安排我到基层一线去历练，于是我来到了生物城城管执法中队。当时中队办公条件很简陋，办公室是租借的，只有一台电脑。中队有10来个队员，做案子得轮流用电脑。那时的生物城刚刚起步，经常会有很多领导和大型企业前来观摩考察，我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跟队员们一起参与保障封控，保证辖区环境干净整洁，给嘉宾、企业家留下好印象，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投资。第一次跟随队员们在路上巡查封控，接待来参观调研的企业时，我心里在想：

“以前我是坐在车子里参观，现在是站在车子外保障，这个角色转换得有点大。”

我们经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点位上连一棵树都没有。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防止渣土车、农用三轮车带泥上路，除此之外还要防止附近村民养的牛羊乱穿马路。我们会经常接到这样的任务：“路上有牛羊，快去帮我们赶一下。”队员们只能抄着家伙去赶牛、赶羊。在中队，我和另一位女同事的职务是内勤，但是由于人手不足，有时候我也

要出去巡逻执勤。局里为我们两位女同志配了台电瓶车，我俩都挺爱干净的，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擦电瓶车，从上到下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去做别的工作。等整理好内务，其他队员们也都出去了，我俩就开着电瓶车到生物城巡逻。

有很多人理解，觉得我放着好好的外企工作不做，非得换到这么辛苦的岗位，何必呢？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对于这一切我是欣然接受的，在每个人生阶段，我想要有不一样的体验。跟这些淳朴的队员们在一起，铆着一股劲在一个地方坚守下来，看着它一点一滴的变化，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后来中队慢慢扩大了，职能有所调整，两年后，我调回局里，担任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负责人。

东湖高新区城管局的老办公地点在佳园路，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只是很小的一个角落，只能并排坐4个人，两部电话，两台电脑，主要任务是接市局的警，然后给投诉人反馈投诉件处理结果。到了数字城管指挥中心之后没过多久，就碰到了一位特别不配合的投诉人，给了我当头一棒。郑桥小路上有一位商户经常出店经营，只要我们执法队员对出店经营行为进行制止，他就会打电话来投诉，而且态度很不好。对于每一个投诉，我们都要打电话给投诉人告知处理结果，但是每次给他回电话他不仅不听解释，而且每次评价都是对我的服务不满意。我是个热心快肠的人，遇到投诉总是想尽办法帮助解决问题，但是有些投诉人一来就是骂人，无论怎么解释都不听，完全无法沟通。我从没遇到过这种场面，觉得很委屈，被骂得流泪也是常事。老队员安慰我说，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能被投诉人的情绪所带动，做好自己分

内的事情。慢慢地工作时间长了以后，我能够做到把工作和生活区分开了。

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实行的是24小时值班制，白班是女同志，男同志值晚班。我当时作为中心负责人，除了工作，还经常组织大家一起沟通交流，借机进行情绪疏导，这样团队才能稳定，大家才能安心工作。在来数字城管指挥中心之前，我觉得这个岗位遇到的都是扯皮拉筋的事情，每天都会影响心情，应该没有多少人愿意来，而作为负责人，我要以情感或者个人能力去使团队更稳定。经过大家的努力，慢慢地，我们的队伍壮大起来了，跟市局、区里各个部门的沟通也更加顺畅，大家的感情越来越深，有些老队员都不愿离开。

2014年、2015年，武汉市正举全市之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创建，东湖高新区的创建指挥部设立在数字城管指挥中心，也就是我当时负责的部门。每天区领导使用视频会议系统与市领导及市创文创卫专班人员召开工作会议，我和同事们要保证各项信息渠道通畅，及时、准确、全面地发现和反馈问题。那段时间，管委会领导、城管局领导和我们一样，每天早上6点钟到指挥中心开始早点名，晚上10点晚点名。

在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工作期间，我对“数字城管”系统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为后来我提出建设“智慧城管”系统相关提案打下了基础。通过“数字城管”系统的运行，我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总结了诸多一线材料，为管委会和城管局创文创卫工作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决策依据，得到

了区领导的充分肯定，2015年被评为东湖高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个人。

我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特别是女性人物传记，从优秀的人物身上学习她们的优点。我很喜欢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传记《向前一步》，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我觉得在工作中，女同志有一些性别优势，但这有时候也是一种劣势，特别是城管工作。我总跟队员们说，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们要有弹性地接纳生活和想象的不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自己拾掇得好一点，调整心态，控制情绪，向前一步。

第三次转变：从普通公职人员到政协委员

加入民主党派是我的第三个身份。2011年我加入了民革。刚开始我的组织关系在民革洪山区工委，当时东湖高新区还没有统战部门和民革组织。



2019年1月，金婵委员在武汉市政协第十三届三次会议上留影

对于我来说，民革洪山区工委确实是一个培养人和锻炼人的地方。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加入党派时，民革有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党员，这些老党员对党派工作很积极也很认真，这种热情也鼓舞了我这个年轻人。在民革，我积极参与党派组织的活动，下基层很认真地做调研写报告，质量都挺高的，得到领导认可。慢慢地，组织发现我这个同志对党务工作挺上心，便培养我成了四支部的主委。原先洪山区工委有三个支部，四支部是后来成立的，专门对接东湖高新区的工作。东湖高新区现在的民革工委，就是在原来洪山区工委四支部的基础上成立的。高新区成立民革工委以后，我担任副主委，主要负责党派参政议政的工作。2016年年底，我成为武汉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这一年，我还荣幸地获得了武汉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在参与民主党派和政协的工作过程当中，我结合城管工作，充分行使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我结合在数字城管指挥中心的工作经历，提出关于“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提案，积极倡导推进建设“智慧城管”。我认为“智慧城管”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把城市里面的每一个部门串联起来，打破原有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壁垒，搭建一个大的平台，实现数据信息共享，我们在平台上开展工作，会更加便捷。

在生活中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此很关心食品安全问题。结合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组织区民革党员到华农水产学院就“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加快数字化可追溯体系的推广应用”课题开展调研。通过实地考察和座谈交流，党员们不仅了解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水产知识，开阔了视野，而且掌握了“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加快数字化可

追溯体系的推广应用”课题的第一手资料，高质量地完成了调研报告。后来这份调研报告转化成了提案，获得了武汉市民革参政议政三等奖，民革中央网站也对此予以报道。

工作中、生活中我喜欢随手做笔记，通过整理相关内容写一些社情民意。记得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的父亲不幸得了渐冻症，在了解到国内这种罕见病收治现状后，我写了一个关于渐冻人医疗的定点帮扶救助的建议，市人社局对此提案予以了回复。

当了政协委员之后，我觉得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了，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力所能及地去把一些事情通过不同渠道，推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得到大家的关注。虽然可能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但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有这个事情。”

无论多忙，我都不会忘记本我和初心，每天不同身份的切换，都记得时不时要和自己对话，要及时充电、不断进步、挑战新领域。在每个岗位上，我尽我所能，去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10多年来，无论身份怎么转变，我都是在东湖高新区，从被服务对象的企业员工，到服务企业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再到作为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都是围绕光谷这片热土展开工作的。从刚大学毕业时的“前浪”，到如今的已步入“中浪”，我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这里。扎根光谷、服务光谷，也见证了光谷，我见证了它的飞速发展，它也见证了我的青春年华。

（金婵：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

传承武道创宏业 反哺木兰桑梓情

◇ 甘治国（口述） 穆艳（整理）

从木兰故土走出来，习武、创业、办学，又感恩桑梓情重回故里，带着满腔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热忱和致力于木兰文化的传承。这就是我，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养育我的家乡木兰故里。

以武为魂投身教育 自创品牌唱响天下

我出生在武汉黄陂，听家族的老人介绍，我家祖先为木兰山南大门的守门人。一代又一代扎根深山，历经岁月扭转，坚定地守护着这座大山，守护着木兰武文化的发源地。因受家庭武术氛围的熏陶，我自小酷爱武术，8岁即开始随父习武。

我的父辈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因经商有道，成为第一批“万元户”，是远近闻名的陶瓷大王。父亲希望我能子承父业，然而我却醉心于传统武学，志在四方。14岁

那年，我毅然告别家人，放弃家里优越的条件，只身一人投奔武当，师从游玄德道长学习内家拳。为了博众家之长，1985年，我又进少林寺研习少林功夫，继而南下福州投入武林泰斗万籁声大师名下，学习“自然门”功夫，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武汉体院学习深造。

习武的辛苦，旁人很难想象。然而正是这种锤炼，带给了我坚韧、不怕苦、不服输的优秀品质，在以后的创业道路上令我受益终生。

随着对武学研习的逐渐深入，我了解到家乡武学条件落后，因此萌生出了办一所文武学校，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武学后备人才的想法。学成归来后，身为国家级武术七段和国家级散打裁判的我，放弃了国家分配做老师的名额，自砸铁饭碗，毅然走上了一条创业的坎坷之路。

1992年,24岁的我自筹资金10余万元,加上父母毕生的劳动积蓄,开始创办学校。经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我在木兰故里全国武术之乡木兰川租下了一座废弃的政府办公用房,经过前期的房屋改造以及各项设备的添置,最初的木兰山武术学校正式揭牌,宣告成立。

学校第一年招生就异常地火热,达到近300人规模,这更加坚定了我弘扬武学教育的初心。随着办学资金的不断积累和规模的逐步扩大,学校不断加大投入,连续在周边选址扩建若干教学基地。1996年,木兰山武术学校迎来了首次华丽转身,学校成功购买了原有的租用地,作为自己的校舍。

有了属于自己的校舍,学校得以迅速发展,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张,发展到2000人,原有的校舍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源需求。2000年,木兰山武术学校再迈出惊人的一步。我追加投入1000多万元资金,在原有校区的基础上,新征土地120亩,在原来的面积上翻了一番,总面积达到260亩。按照国家示范学校标准建设校园,包括

建设现代化教学楼、舒适宽敞的学生公寓、幽雅整洁的学生餐厅、功能齐备的室内训练馆、体艺馆和实验室等,并对功能分区和基础设施整体改造。至此,木兰山武术学校以完善的教学设施、优美的自然环境,实现了办学跨越式发展。同时,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需求,学校正式更名为木兰山文武学校,采取文化教学为主,武术为特色的新型教育模式。

为适应当代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打造优质高效课堂,我以“优教乐学”课堂教学改革为抓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以务实求新的教学理念来激发师生“教”和“学”的内驱力,从而锻造学生综合能力,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丰富的情感,最终提升师生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同时,我提出了“崇文尚武”是木兰山文武学校的办学理念。“崇文”包含了智育,也包含美育、礼育等内容,既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也包含当今世界优秀的文化知识。“尚武”即崇尚武艺。我将“尚武”赋予了更丰富的教育内涵:体格强健,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尚武”融合了德育、体育等内容,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崇文尚武”为木兰学子发展注入了动力,继承发扬木兰精神,磨砺心志,锻造品格,成为有高远志向、报效国家的有用之才。

我们学校因材施教,致力于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坚毅的品格、强健的体魄、报国的理想,引导学生实现人生价值以及为社会创造价值,成为有益于社会、乐于



木兰山武术学校大门

奉献的有用人才。多年来，我们为国家培养了诸多栋梁之材，被誉为传承木兰武术文化、弘扬木兰爱国精神的“中南武林劲旅”。现任湖北省体育总局散打总教练、亚洲散打冠军肖春，深圳特警教官黎斌，深圳龙城高级中学体育老师黄成林均是从木兰山文武学校走出来的优秀毕业生。1997年香港回归，第一批驻港部队中，就有来自木兰山文武学校的6名优秀毕业生。

办校28年来，木兰山文武学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奋斗历程，其间有建校之初的艰辛与奋斗，兴校之路上的磨砺与探索，强校之途中的开拓与创新。我带领着木兰山文武学校的武术教育团队负重前行，只为把自己一生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所钟爱的武术教育事业。我希望将中华武术这颗灿烂的文化瑰宝传播出去，在木兰故里这片武文化的教育热土上，让更多的人热爱武术，从小习武修德。

深度挖掘木兰文化 匠心坚守奉献故里

匠心是一种信仰，是一丝不苟的专注，是持之以恒的坚守。我生在木兰故里，长在木兰故里，饮水思源，木兰精神是鞭策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木兰文化的千年辉煌，每一笔的史书记载，都是华夏文明精髓最美的诠释。作为一名木兰人，我有责任去传承和保护家乡的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带着这份使命，2000年，我投资近2000万元，在木兰文化发祥地木兰山旅游



2006年11月，甘治国参加第三届中国市场品牌峰会论坛，木兰山文武学校荣获“中国民办学校十大品牌”称号

风景区兴建了一座标志性建筑——木兰文化城。她像一张大气凝重的名片，展示着历史名将花木兰的传奇人生及由此而生发的木兰武术文化，成为木兰山景区的室内主题公园。文化城为进一步地宣传、助推家乡“木兰”品牌贡献力量，通过承办国内外各级武术赛事，开展武术竞技表演与学术研讨交流，展示木兰武术高、威、精、深的武术文化，弘扬木兰精神。作为木兰武术文化发扬光大的动力之源，这也正是木兰文化城应运而生的传承之基。

为了进一步保护木兰文化，2015年，我怀着创业初心，再一次启航，以木兰文化为依托，借木兰旅游之势，木兰武校之力，着力打造木兰武镇旅游产业链。

木兰武镇分两期逐步修建。一期占地3000亩，二期占地5000亩。武镇立足木兰川，树立文旅融合、校景一体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武校占据的多重优势，深度挖掘有关木兰的武文化，有理有据，铺垫木兰武镇文化之脉、落地之基，打造一个百年经典、

环境优美、情景迷人、故事动听的美丽武镇、传奇武镇、功夫武镇以及中国的武镇、世界的武镇。

一片丹心贡献良策 心系民情谋求发展

1995年，我成为黄陂县政协委员，又被共青团黄陂县委推荐为武汉市青年联合会委员。2012年至今，我连续成为武汉市第十二届、十三届政协委员。我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方式，积极参加政协的各项活动。2015年，我参加了文明城市建设承诺整改工作督查组，担任副组长，同第六督查组委员一道，深入新洲、黄陂、硚口区，通过明查暗访、座谈等形式，及时发现问题、反馈问题，在文明城市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从2016年开始，我参与到武汉市电视问政中，积极收集民情民意，并认真解读市民提出的疑问。

作为一名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我时刻关注教育，心系民情民意，积极为武汉市的民办教育建言献策。通过前期大量的调研，我了解到随着武汉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步伐加快，“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民办学前教育规模持续增大。在我市民办学前教育数量、规模向前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该领域监管中亟待加强的一些问题。为此，我提出《关于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监管体制机制的建议》等提案，很快得到了落实，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社会对于民办教育的诉求。

庚子年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作为一校之长，同时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政协委员，我按照省、市、区的统一部署，为保证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迅速成立了校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身为校长的我，以疫情为命令，带领全校党员干

部全力以赴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下沉一线，共筑战疫防线。通过线上宣传，及时向全校师生传达防疫指示精神、防疫措施、防疫方法。全校上千师生员工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中无一例感染，为整个武汉的防疫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在确保校园防疫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了一批素质高、有担当、甘于奉献的志愿者，大家不顾个人安危，逆行而战，下沉基层梳店社区，组织群众购买生活物资、紧缺的医疗防疫物资。特别是对于70岁以上的贫困老人，我们点对点上门服务，及时解决他们生活所需物资，保得了一方平安。我在此次防疫中积极响应号召带头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彰显众志成城的武汉抗疫精神。

这些年来，我一直珍惜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它给了我这个参政议政的舞台，使我在这个舞台上为民唱出心声，这是一份神圣的责任。

（甘治国：十二、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木兰山文武学校校长；穆艳：武汉木兰山文武学校宣传部工作人员）

仁者巨匠 国坝之魂

——追忆在郑守仁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

◇ 陈磊

2020年7月24日，郑守仁院士因病去世的消息传到三峡坝区，坝区广大工程建设者无不感到震惊和悲痛。郑院士的病情我一直是了解的，他已经和病魔顽强抗争了很长的时间，但我总是期待奇迹能够继续在他的身上发生。郑院士一生经历了很多的挑战、创造了无数的奇迹，而这一次他是真的离我们而去了。泪眼模糊之际，和郑院士在一起工作的往事，特别是他重病期间坚持工作的感人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初见郑守仁院士是在1987年，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进入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从事清江隔河岩重力拱坝体型设计和坝肩稳定分析处理。工程当年正式开工。为了及时掌握现场地质勘测的最新成果资料，便于和清江地质大队的同志们联系交流，我常在工地开展现场设计。当时的现场设计负责人就

是郑守仁院士。郑院士时任长江委副总工，我们都称呼他——郑总，她的夫人高黛安也是导截流方面的资深专家。夫妇俩以工地为家，长年驻守在隔河岩工程现场。

初到工程现场时，坝址地貌还是原始状态，查勘时常遇见蛇虫，现场条件非常简陋。我们在清江地质大队二工区院内借了几间房办公兼住宿，郑总夫妇敦厚随和，衣着朴素，和院子里的勘测队员们没有分别。30多年前的工地环境条件远不如现在，经常遇到危险，有时甚至还会受伤，我的脚就曾被积水中隐藏的锈钉穿透，幸好工人师傅及时用土办法帮我放出污血，并经过医生治疗才无大碍。

逢年过节，办公室会突然摆出丰富的美食、点心还有红酒，有很长时间我以为那是单位的福利安排，毕竟这时候食堂都已关

门休息了，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郑总夫妇私人置办的，当时竟连声谢谢都没说过。每次和郑总一同出差，途中吃饭都是他掏钱买单，且从不开发票。身边有同事生病或家中有困难，郑总夫妇也都会施以援手。

平时和郑总走在施工现场，他常常与遇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驻足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大部分都叫不上名字甚至完全不认识，但他们都亲近并信赖他，愿意和他说心里话，反映现场的真实情况。逢年过节，郑总必会到施工现场看望和问候一线工人，绝无半点违和。渐渐地我也明白和体会到了建设者们的心声和感受：郑总的心里永远装着工程，他的心里只有工程，他是建设者们的主心骨。

郑总亲历亲为，处处以身作则，深深地感染、带动了所有的设计人员。大家都自觉地以他为榜样，不讲条件，不分昼夜，一切为了保证工程需要。画图的桌子不够，就用床板代替；下工地没有车，就靠两条腿。因为设计供图及时服务到位，工程开工当年

便实现截流，提前半年发电。郑总作为技术带头人，被授予设计单位唯一的“隔河岩工程特殊贡献奖”。

1993年，郑总离开隔河岩前往主持长江三峡枢纽工程设计工作，而我被留下继续完成隔河岩现场和竣工工作，一年多后隔河岩电站全部完工，三峡主体工程也已经开工，我便转赴三峡坝区，再次来到郑总身边工作。

三峡工程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工程规模宏大，涉及专业范围广，技术复杂，很多方面的技术指标超出已有工程经验，世界之最达上百项之多，需要面对大量的极限挑战。郑总作为三峡枢纽工程设计总负责人，不仅要总揽全局，组织、协调勘测、规划、水文、科研、设计各方，确保三峡工程的技术供应，还亲自驻守工地，组织现场的技术服务，解决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工程建设期间，他先后主持召开三峡工程现场设计讨论会2500多次，形成会议纪要6800多万字，

亲自撰写现场设计工作简报500多期、400多万字，为确保三峡工程的设计质量和施工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们常说设计是工程的灵魂，那么郑总就是灵魂的中枢。枢纽布置、超大流量泄洪、大坝深层抗滑稳定、衬砌式船闸和高边坡、超大流量截流和深水围堰、大体积混凝土快速施工和温度控制、大型水轮机组设计等



1997年，郑守仁院士（左二）与设计人员在三峡升船机工程施工现场

每一项重大设计项目的完成和技术高峰的跨越，都凝聚着郑总的心血和汗水。

三峡工程的成功建设，全面提升了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技术水平，带动了我国水电装备制造业跨越式的发展，推动了世界水电行业的发展进步。郑总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宏大的事业中，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每

天靠加量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几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侵蚀了他的健康，终至积劳成疾。

2015年，郑总被检查出罹患肝癌，经过连续的手术和放疗，医生反复强调要卧床休息，但郑总反而加快了工作的脚步，他要和病魔抢时间。

三峡集团领导在得知郑总的病情后，考虑他身体虚弱，行动不便，提出要给郑总换一个有电梯的地方居住办公，被郑总当即回绝，于是又提出在原宿舍楼一楼重新整理一套间，请郑总从四楼搬下来。郑总犹豫了，因为当时老伴的身体也不好，平地行走都需要借助拐杖，上下楼更是非常艰难，然而夫妇俩商量了一晚上，第二天还是婉拒了。郑总对我说，他们现在的条件已经非常好，三峡集团对他们够照顾了，不能再麻烦人家，更不能搞特殊。

这一年的年底，三峡升船机工程进入试通航前的冲刺阶段，上闸首辅助闸门首次挡水调试，发现前期施工的门槽混凝土内部



1998年，郑守仁夫妇在三峡工程二期围堰施工现场

存在质量缺陷。由于检查和处理会影响试通航工期，于是有人提出留待运行后再作处理的建议。为此，郑总果断提议三峡枢纽质量检查专家组于2016年1月6日在三峡坝区进行专题调研并听取情况汇报，督促相关方面在升船机试通航前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认真处理。为了一个具体的质量缺陷采取这种高层级方式干预是极不寻常的，但又非常符合郑总一贯的行事风格。仁厚宽容的郑总在工程质量问题上从来是刚毅坚定、敢于碰硬的，在他心中不让升船机带着隐患运行比什么都重要。

郑总始终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积极参加三峡代表局党支部的活动，重要的材料学习完还要拿回去仔细研读。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峡工程并给予高度评价，郑总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结合工程实际撰写了《三峡工程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关键地位及其重要作用》《三峡工程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安全支撑和保障》等多篇重要文章，积极为国家高质

量发展战略和新时代治江事业建言献策。

三峡工程一直是中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前来采访报道的媒体记者很多。对于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郑总从来都是严谨细致、不厌其烦地进行讲解和回答，对他本人的事迹却往往不愿多谈甚至有些抵触，但只要我以支部书记的名义对他说明是组织上安排的任务，他都无条件接受下来。他在病重期间，还不忘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代他按时缴纳党费，用一辈子身体力行践行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2018年是三峡枢纽正常蓄水位175米试验性蓄水10周年。经郑总倡议，由中国工程院、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集团共同主办的“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175米试验性蓄水运行10年学术研讨咨询会”于2018年11月在三峡坝区召开。50多名院士专家以及相关各方的领导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10年来的运行情况 and 实际效益，总结经验，提出意见，展望新

时代三峡工程在长江大保护中的使命和担当。郑总从组织策划、资料准备、会议总结等各个环节亲自指导并编写报告，其主旨报告完全是在医院病床上写成，再交我制作成演讲材料的。会上由郑总率先作主旨演讲，考虑到郑总的身体状况，主持人安排郑总坐着讲，可郑总不答应，不顾重病在身坚持当场撤掉座椅，全程站立完成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报告丰富详实，声音铿锵有力，为科学全面总结评价三峡工程凝聚了共识，奠定了基础，报告结束掌声如潮，经久不息。

因为当年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对隔河岩工程的宝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郑总的心中对此甚感惋惜。他说，三峡再不能留下遗憾。为了和病魔争夺时间，郑总直接将会议室当作办公室，在满屋资料文献中奋笔疾书，我和代表局的同志们全力以赴，也常常跟不上他的进度。在郑总日复一日地辛勤忙碌下，200多万字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设计及施工技术》终于完成。由于郑总

住院手术，书籍的校审工作主要是我配合出版社进行的。书出版后，他才看到序言里长江委马建华主任对他的高度评价和赞誉，心中非常不安，他对我说：“三峡工程是民族的百年梦想，凝结了长江委几代人的心血，我只是其中的一员，不要总强调我个人的作用。”

2019年，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郑总作为项目提名人代表兼答辩



2010年10月，郑守仁院士（右）在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至175米会议上发言

人，不仅细致归纳总结了三峡枢纽技术难点及关键技术，并亲自指导和参加相关策划、协调、汇报、讨论、考察和资料编写。8月进入综合组复评的关键阶段，由于多次手术和连续放疗，郑总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声音嘶哑，听力下降，双腿肿胀，他白天坐在会议室工作，晚上回到房间连坐都坐不住，就躺在床上，将思考的问题口述出来，由我连夜记录、整理，再打印给他。为避免答辩时听不到评委的提问，事先约定由坐在旁边的张超然院士拉扯他的衣袖以示提醒。答辩时，大家都为郑总的身体状况揪着心，可郑总开口答辩的声音竟格外的清晰洪亮，透过隔音门传到了答辩室外的大厅，仿佛心底喷薄而出的信念之光点亮了全场，在场领导和工作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郑总除了住院治疗 and 外出参加科技活动，其他时间必定回到三峡坝区，节假日更是如此。2019年国庆期间，郑总病情不断加重，吃不下饭，上卫生间都感到十分吃力。10月8日，在三峡集团的协助下，我和局办的同事将他搀扶上开往武汉的动车，同时联系了汉口的同志立即安排他住院，可是他却坚持来到东湖水环境治理工程的现场，听完方案汇报并作了长篇发言，直至支撑不住昏倒在会场。

郑总住院期间，我去武汉工作都会到医院看望他，和他说说三峡工程的情况和进展，那时他的眼神会变得专注明亮，脸上露出愉悦的神情，嘴上却不断催我回去工作。回到三峡坝区我便把重要的工程讯息发到他手机上，由身边工作人员念给他听。12月27日，三峡枢纽最后一个单项工程升船机通过了竣工验收，我把相关情况和验收组领导专家们对他的问候发给他，他还高兴地回复：“谢谢领导专家们的关心！”可仅仅

过了2个月，由于病情加重他已说不出话来。他留给我的最后叮咛就是“好好工作！”郑总参加工作50多年来，始终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工作几乎占据了他生命的全部，充分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情怀，为新时代水利行业和长江委精神树立了标杆，我定将加倍努力，做好每一项本职工作，不负郑总最后的嘱托。

在郑总身边工作的33年里，我亲眼见证了他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矢志不移、顽强拼搏的忘我奋斗历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家授予他“最美奋斗者”的称号，是对他一生崇高品德和卓越功绩的高度评价和真实写照。如今他疲惫的身躯停下了前行的脚步，但他的名字将随着奔腾的江河传遍山川大地，他的事迹将永远激励万千建设者在迈向水电强国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如若在天有灵，他一定会回到心心念念的长江三峡上空，深情守望亲手打造的国之重器，继续护佑它造福后代子孙，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提供不竭的强大动力。

（陈磊：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设计院枢纽院副总工程师）

我的三件“防护服”

◇ 章 旂

2020年1月23日，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武汉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按下了暂停键，武汉封城了！随着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打响，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和公职人员就近下沉到社区和乡村，投身抗疫战场。武汉市党员干部迅速下沉到社区防控一线，逆行在寂静的街区，化作城市的“盾牌”，护卫万家灯火。作为新党员的我，也加入了这场武汉保卫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战士，奋战在社区防疫第一线。我的三件“防护服”，见证了一名普通党员的战疫历程。

第一件“防护服”伴我度过惶恐和不安

2月11日，武汉已经封城半个月了，交通管制，商店关门，物资紧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求医问药，都难以为继。我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党建群里

看到了省委、省政府号召党员干部就近下沉社区参加防疫工作的通知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立即到所在的武汉市江汉区富豪社区报到。当戴上社区书记发给我的值勤袖章时，我仿佛回到了15年前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充满自豪和光荣。但回家之后，我不免开始担心起来，现在正是社区大排查任务最艰巨的时期，要确保所有感染患者转运医院。无疑，下沉社区做志愿者是一份很危险的工作。由于防疫物资匮乏，社区要求我们自备防护用品，而明天就要参加社区大排查工作的我，除了口罩之外，什么也没有。此前在家隔离的20多天里，除了下楼丢垃圾，我从未外出过。想到明天面临的挑战，我紧张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2月12日，早上出门前，父亲看出了我的担忧，他马上找出了2019年看军运会比赛时发的一件黄色雨衣，仔细擦干净上面的灰尘，一边帮我穿上，一边说：“你是党



2020年2月，章旂（右）穿着第一件“防护服”在社区开展电话排查工作

员，参加防疫是你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没有防护服，但这件雨衣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穿上它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我们的社区！”穿着父亲给我的雨衣，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我突然不那么害怕了。有了这件“防护服”，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一到社区，大家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我拿到一本电话号码登记表，挨个给居民打电话询问体温，电话那头大家也都积极配合着。4个小时过去了，我觉得口罩闷得自己喘不过气，头晕胸闷，赶紧跑下楼找到没人的地方，小心翼翼取下口罩喘气。想到医护人员每天戴着口罩、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工作十几个小时，而自己才工作了4个小时就坚持不住，未免太矫情了。下沉到社区就是上了战场，我已经是一名战士了！于是我赶紧用酒精给雨衣消了毒，继续返回战场。

2月16日，我与网格员一起入户排查了600多户居民，晚上回家测体温居然是37.2℃，一家人都很紧张。我把自己“隔离”在房间，一夜难眠，胡思乱想着自己会不会被感染、在哪里被感染、会不会传染给其他

人……躲在房间里，我一边绝望地掉眼泪，一边刷着手机，当刷到方舱医院里病人和医护人员一起跳广场舞的视频时，不禁笑了起来，“感染了也不怕，大不了我也去方舱医院跳广场舞！”

2月17日，我体温恢复正常，突然发现原来“虚惊一场”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语。我穿好“防护服”，继续投入到下沉社区的工作中，组织团购、上门排查、宣传防控知识、门岗值守、为居民采购药品、分送爱心口罩……短短几天时间，平时从来不打照面的邻居们

都认识我了，因为我的名字有点难认，她们干脆叫我“小黄”（因为我的“防护服”是黄色的）。“小黄，帮我买10斤面粉吧！”“小黄，谢谢你帮我买的药。”“小黄，咱们小区什么时候能吃上爱心菜呀？”一时间，“小黄”成了群里的高频词，被人需要和信任带给我莫大的幸福感。小区里虽然清冷，但是微信群里却很热闹，十几个团购群里每天各种信息不断，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居民的需求，我每天盯着手机做记录，还动员更多的邻居参与到志愿者队伍中。大家轮班值守，一起采购，一起配送，一起研究哪里还有防控死角，一起讨论如何给居民提供更安全便利的服务……大家互相关照，彼此信任，朝着“零增长”的目标共同努力着。

第二件“防护服”给我邻里间守望相助的温情

2月25日，我在小区门口值守。在劝返一位想要出门买菜的老奶奶时，得知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国外，家里只有她和老伴两

个人，年前从徐州来武汉帮小儿子守房子，没想到因为疫情被困在了这里。两位老人身边没有一个熟人，没有微信，不会团购，连武汉话也听不懂，家里已经30多天没吃过新鲜蔬菜，老伴的药也吃完了。我马上让老人列好清单，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采购食材和药品。那天的风很大、天很冷，但我拖着20斤大米和十几斤蔬菜到老人家门口的时候，已经是汗流浹背。老奶奶拿出一件新雨衣，对我说：“姑娘，谢谢你！你对我的帮助，我会一辈子记着，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刚才看到你的雨衣都破了，这件新的送给你。你这孩子热心，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老奶奶的话，让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我那件消毒过好多次也不敢丢掉的“小黄”，也因此正式“下岗”了，穿上新的“防护服”，感受着邻里间守望相助的温情。

2月28日，一大早接到社区电话，说要接收一批爱心菜，但是社区的车不够用，问我能不能开自己的车去拖。“爱心菜”这三个字在小区群里已经频繁出现好几天了，很多不会团购的老人和精打细算的邻居们，每天都在群里打听什么时候能吃上爱心菜。所以当我一听到“爱心菜”三个字，便兴奋地跳下床，平时起床后要在家臭美半个小时才出门的我，现在也顾不上洗脸了，戴上口罩就往楼下跑，生怕去晚了爱心菜就没了。到了楼下，已经有两位男同志在等我，“你一个女孩子肯定搬不动，我们跟你一起去吧！”到了发菜的地方，我们撸起袖子，把一个个装满爱心菜的蛇皮袋子搬上车。虽然车子沾满泥巴有点心疼，但看到居民们领到爱心菜后隔着口罩也掩藏不住的笑容，一切都是值得的！

3月3日，在向居民们送爱心菜时，意外获赠了邻居阿姨亲手做的蛋挞。我小心翼

翼地把蛋挞藏在“防护服”里带回家，用相机拍了好多照片也舍不得吃。要知道，在这物资匮乏的非常时期，这些“个性化”的美食是多么的奢侈啊！封城的日子不知道还有多久，邻里间同舟共济的情谊，给我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温暖和快乐。

第三件防护服伴我见证了城市的复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武汉地区的防疫物资逐渐丰裕起来。

3月10日，单位领导带着外省捐赠的防护用品慰问下沉党员，我终于有真正的防护服穿了。这是我的第三件防护服，它陪伴我坚守在小区门口，闻着熟悉且让人安心的消毒水味道，看着寂静的小区开始热闹起来、空荡荡的街道逐渐车水马龙、这座城市一天一天复苏，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

3月22日，上网课、写总结、发爱心口罩、采购药品、送药上门、查资料、写稿子、审录音……从早上起床我一刻也没停歇。为了丰富大家居家期间的精神文化需求，我白天坚守社区之余，晚上在家策划和组织撰写“云游红楼”和“首义微课堂”系列文章，已经在我们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公众号上推出10多期了，不断上涨的阅读量和点赞的数字给了我更大的动力。其中，我把武昌起义中的文物历史与抗击新冠疫情的英雄事迹相结合写的那篇《武汉：一座英雄的城市》在当天晚上的楚天交通广播节目中播出，邻居们得知这个消息，都早早地守在手机旁等待着。那晚的群里格外热闹：

“小黄，我们今晚都来给你捧场啦！”“大家一直叫你小黄小黄，我们都以为你姓黄呢！今天听了广播才知道你的名字到底怎

么念！”“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为我大武汉骄傲。”“百年前的勇士为了人民的利益英勇牺牲，值得后人永远纪念。2020年逆行者更值得武汉人民点赞。”“胜利就在眼前，武汉加油！”……看到这些既有豪情又充满烟火气的留言，听着播音员深情地念着我的稿子，我更加深深地感受到无论是1911年武昌起义的硝烟战火，还是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战场，武汉从来都不缺少英雄的气概。

计划完明天的工作，已经是晚上12点了。7天没洗的头发提醒我离精致女孩越来越远，但朝九晚十二的生活让我觉得自己离英雄的人民越来越近！加油！热干面！

4月8日，武汉解封了。按照要求，下沉党员要逐步复工，我也要回单位上班了。但小区封控还不能解除，所以值班人手十分短缺。关键时刻，61岁的父亲站了出来，他说：“我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志愿工作也应该有我的一份。你安心去上班吧，小区值守的任务交给我了！”经过社区网格员的培训后，父亲正式上岗了。当我下班路过门岗时，看到父亲穿着我的防护服，站在大门口认真询问每一个进出居民、仔细做好每一次体温测量和登记，我心里无比感动和自豪。

4月11日，社区为我们颁发了江汉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纪念证书。看到这份证书时，我再一次泪目了。在这场疫情大考中，作为新党员的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寒风刺骨的二月，到蚊虫叮咬的四月，护目镜下的一滴滴汗水，社区居民的一封封感谢信，我经手的一张张购物清单，还有这一件件陪我经历了风吹日晒的“防护服”都成为了这60天下沉工作最宝贵的见证。在这

段下沉经历中，我结识了八方来援的基层战友，帮助了隔离在家的社区居民，并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篇篇抗疫红色故事。从惴惴不安的悲伤时刻，到共同迎接的胜利曙光，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化身为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千千万万个志愿者一起，填补了疫区艰难转运中的缺环和空白。无论是下沉社区的志愿服务工作，还是“首义微课堂”的坚持和创新，我始终与英雄的武汉人民坚守在一起，共同奋斗。

4月13日，我工作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面向社会征集抗疫实物，为“明天”收藏“今天”。我将纪念证书和三件“防护服”一起交给馆里收藏时，看到了很多从不同地方征集来的抗疫实物：有援鄂医疗队的队旗、交警的感谢信、社区工作者的笔记簿……看到这些，我突然明白了“今日中国，取决于我们的前人，而明日中国，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道理。这一刻，我也更加深刻地懂得了，为什么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那些逆行而上的背影，那些同生共死的坚守，那互相“搭把手”的守望相助，那隔着窗户共唱国歌的洒脱乐观……不正是对武汉这座英雄城市最好的诠释吗？我们用自己的英勇行动，坚定地守护着我们的城市，用滴水之力汇聚起滔天洪流，改变了疫情的走向，推动着武汉的发展。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章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社教部副主任）

“最老大智门火车站”现身汉口

◇ 侯红志

近日，原籍武汉的旅英华人范榕先生给我发来一张晚清时期大智门火车站近景照，据称，这张照片由对武汉很熟悉的意大利建筑师马方济提供。范榕先生同时还提供了一本晚清时期京汉铁路全线开通的照片册，其中有张火车开进大智门车站的远景照，与这张近景照为同一场景。

近景照主体部分为一层西洋式小型站房建筑，坡屋顶前出，由斜衬支撑形成风雨廊，门窗及房顶缀有欧陆配饰，大门前放有称重地磅。照片中点处站有两位洋人和一位外国传教士打扮的人，其身后站牌下方为中文“汉口大智门”，上方左边为英文“汉口”，右边为法文“城市”。此前，在有关历史文献照片中，京汉铁路汉口老城区大智门车站前后曾有两座站房，一座是两层砖石结构站房，一座是保留至今的法、德四堡式建筑站房。这张照片的出现表明，1906年京汉铁路开通时，曾建有一座小体量的欧式站房，这座站房何时拆毁重建了第二座站房？有待查证。

大智门车站的历史碑记

京汉铁路大智门火车站相继毁建的这三座站房，延续了100多年历史，是中国早期铁路建设史的见证，也是武汉城市发展的见证。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武汉城市发展关键因素之一是修成了京汉铁路，在这本照片册的内封上写有中文“中国铁路总公司承造中国铁路比公司京汉铁路”，时间为“1899—1905年”，其中，“比”为比利时。这段文字印证了晚清朝廷开建京汉铁路的曲折开端。

京汉铁路开建时名为卢汉铁路，从提出动议到正式开建，达7年之久，其中主要难题在筹款。张之洞预计全路造价银1600万两，“当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共行始能成事”，后官款不能到位，商股筹办落空，最终定于“暂借洋款”。

1896年，盛宣怀出任铁路督办，设大清铁路总公司于上海。1897年，张之洞通

过盛宣怀向比利时银行借款。是年5月，大清铁路公司与大比银行工厂合股公司订立《卢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450万磅（合中国库平银3750万两），20年还清。借款落实后，卢汉铁路分别由河北、湖北两省分段同时动工。

卢汉铁路后易名京汉铁路，这次易名表现了清廷对铁路又爱又怕的心态。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晚清朝廷内部顽固派与洋务派就修铁路有过激烈争论。1880年，朝臣刘传铭、李鸿章均提出过修铁路用于兵运、商务、矿务、漕运，均被顽固派以有生事、扰民、（洋人）夺利之弊而阻止、搁置。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初二，张之洞乘顽固派驳难刘传铭主张修（天）津通（州）铁路相持之时，上奏《请缓建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线折》，提出不急修津通，先修北京至汉口的铁路，致顽固派对内陆省份修干线之议猝不及防。清政府肯定了张之洞的主张，认为该计划“尤为详尽”，给予照准。

北京至汉口铁路开工修建之初，清廷一些要员依然对这个“害根本、害风俗、害财用”的“妖物”怀有戒心，京师重地对铁路仍是欲迎还拒，便将起点定在京郊的卢

沟桥，终点定于汉口，故名卢汉铁路。待到1906年建成开通时，朝廷已于庚子国变后痛定思痛，再续洋务，铁路便一直延伸到北京城的正阳门，名称亦改为京汉铁路，至1928年，北京又改为北平，亦改称平汉铁路。

卢汉铁路开工后，1898年5月，汉口玉带门至滠口段长23.5公里线路竣工；1902年汉口至河南信阳段建成通车；1906年3月，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14.49公里全线建成通车，4月1日举行通车典礼，清廷派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验收，大智门火车站当时所建站房，便是这张新出现照片中的建筑。

第二代站房毁于战火

在本文这张老照片出现之前，文史界一直认为，大智门车站只有过前后两座站房，一座是现在已挂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今天汉口京汉大道车站路、那座有四座塔堡的建筑。另一座，则是在各种资料中出现的，先于这座站房的洋房式站房，该站房占地800平方米，主站房为两层结构，斜面坡顶，弧形拱券门廊，方形砖雕壁柱，



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时的大智门火车站。左为近景照，右为远景照

两侧配以单层附楼。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阳夏保卫战打响，大智门车站的部分建筑被炮火损毁。

现在的大智门车站站房建于1917年。1917年12月30日，《汉口中西报》刊发《扩充火车站之伟观》新闻，此时，新大智门火车站经改建落成。新大智门火车站由比利时贷款，法国工程师设计，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是法、德四堡式建筑。客运室为两层木结构，钢筋混凝土楼板、木架屋，方斗形铁皮屋面。站房正面中内有一超大的半圆拱窗，两侧各有2座绝对尺度很大的塔堡。站房坐西朝东，面临租界，楼上办公，楼下售票、候车。这座四堡式的新车站确实要比老车站宏伟了许多，比第一座车站更加庞大。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大智门火车站与汉口城堡有着密切的关系。居仁坊、由义坊、循礼坊、大智坊是汉口镇最初的四坊。1864年，为防后湖水患冲击汉口集市，另一方面也为防捻军南下，汉阳知府袁焜主持修筑汉口城堡，上起硃砂口，下到一元路，共设八个城门：玉带门、居仁门、由义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以及东西两个便门。沿着汉水、长江至今天的中山大道，即从硃砂口路至一元路之间的范围，均在汉口古城堡所筑起的高墙之内。在卢汉铁路修筑期间，城门所在地均成为与铁路垂直的交会点，随着汉口城堡的拆除和城墙的消失，新的商业街道空间开始形成，而以铁路站房为核心的商业辐射形态日渐成型与完善，从整体上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格局。

武汉人过去有句老话：“一生不出门，是个大福人。”说的是出门难，难在路难行。

铁路开通前，外埠走武汉主要是水路和前人留下的驿道，运不了多少货物。武汉地处中部，为四川、陕西、河南、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湖北九省通衢，但北方的天津商业圈仍令武汉难以望其项背，河南商人大多跑天津做生意，河南省郾城、周口一带货物主要经沙河、周家口输出镇江。京汉铁路建成通车后，这一带的货物则改由周家口至漯河由铁路输往汉口，河南人南来入汉者剧增，致“汉口与河南密接”。武汉对南、北方经济的吸引力大增。

京汉铁路通车前，从北京运货到武昌，沿着古驿道要走27天。有了铁路后，“普通快车60个小时可以到，快车只需36个小时”，而且运货量也不可同日而语，比以前用畜力、人力运输高出千万倍。当时有统计说，汉口的商品流通总量迅速增加了4倍以上。当然，这还是当年的记录，单凭速度而言，现在坐高铁，几个小时便可从武汉到北京。

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市区建成了江岸、大智门、循礼门和玉带门4个车站，从此，武汉市场呈现火车、轮船、货运、客运交互联运的格局。《汉口县志》记载当时地价飙升的情形说：“猥自后湖筑堤，卢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土寸金。”

车站始终不在法租界内

当年，大智门车站在汉口五国租界中离法租界最近。卢汉铁路修建时，法国人便对即将到来的巨大商机垂涎三尺，企图将其揽入怀中。但法租界边界最终却停留在距火车站60丈之遥，此事源于张之洞在外力夹缝中的“守土”之举。

在比利时承办卢汉铁路时，由于法国人暗中使劲，“比国暗将股份转售法人，

其工程师多系法人。”在卢汉铁路建设全面铺开时，法租界背面的大智门车站也在建设中，这刺激了法国人将租界与车站连接起来的欲望。自1901年5月起，法国领事屡次要求展拓租界。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盖其意不仅在宽展租界，实欲揽我路权也。路为中国之路，所经之地必须全系华界……若与一国租界毗连，则平日官民商旅搭车运货，固多不便。一旦有事，转运兵械粮饷，尤为外人所挟持。”便极力阻止法国人的企图。经多次谈判，1902年11月12日，湖北汉黄道江汉关监督与驻汉法国领事签订《汉口展拓法租界条款》，把法租界向西扩展到（汉口）城堡以外，自官地西距铁路60丈为止。

关于这60丈，法国人其实并没守规矩。抗战武汉沦陷时期，法租界曾在其边界竖栅栏，封闭租界。竖立在车站路的栅栏与大智门火车站保持“60丈”距离，因而日本人得以在车站前面拍照，留下了占据车站的照片。1991年，武汉沦陷时期曾住在法租界的武汉老人、台盟武汉市委员会顾问张厚恺曾亲自丈量这“60丈”，他说：“法租界西界线，专家学者论著都维持在‘60丈之界’，而且都以车站路永贵里与长安里之间为分界线（永贵里属法租界）。车站路西栅子即设于永贵里西墙角，我用步量法量出永贵里西墙至铁路线大约160公尺，相当于48丈。同时，我还观察天声街、如寿里、辅堂里、新成里、平安里等处法租界旧界形成的西界线，距铁路线不是60丈，而是48丈。”

抗日战争时期，大智门火车站风云际会。1937年9月17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正是从这里北上抗日，血战成仁，终得马革裹尸还。1938年春，八

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这里莅临武汉。台儿庄战役中，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以身殉国，灵柩经大智门车站运抵武汉。这一段往事为老车站书写了一页页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大智门车站老楼今夕

1991年10月，汉口火车站搬迁后，京广线穿越汉口中心城区路段被拆除，改造成京汉大道。今天，武汉轻轨一号线穿行于老京广线的脊背之上，大智门轻轨站代替了原来的名号。大智门火车站站房建筑经过整修，大体维持了原有的风格。有段时间，车站候车厅曾出租给“动力火车”迪斯科舞厅。后来，武汉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收回管理，曾花100多万进行维护。作为武汉地区重要的工业遗产旧址，大智门火车站站房建筑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10月，武汉市文化局提交将大智门火车站改造成博物馆的请示报告，当时市领导作了批示，并转发至轨道公司，该公司曾作出过成立陈列馆的预案。2006年9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布衣参事胡全志曾提出《中国武汉铁路历史博物馆》的建议案，提议规划车站本身与周边环境的配套建设，将火车站建成实物馆，两侧铺上铁轨，摆上铁道机车，复制站台原貌，恢复引入车站路等地的老字号，综合打造以大智门火车站为中心的商贸历史文化旅游区。

（侯红志：曾任武汉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老武汉商业习俗一二

◇ 王琼辉

市声入耳

市声，是那些从事交易的小行商、小摊贩，为使顾客了解自己经营的商品，自然而然用口头或做出各种表示，这就形成各种各样的市声。市声起源于何时，已很难考查。

市声包括叫卖声和代声两种。叫卖声是直接说明所售商品的口头传承，内容带有极大的宣传性或诱惑性，形式多有节奏性或音乐性，小商贩用得最多。老武汉城里卖西瓜的小贩吆喝着：“谁吃大西瓜哎——青皮红沙瓤，甜如蜜来，尝一尝！”走街串巷的修棕棚床的师傅，肩背一只放着棕绳麻线和藤条的大口袋，一路喊着：“修理——棚子藤床。”扛着磨刀凳、磨刀石和小水桶的师傅反复朗声叫道：“磨剪子嘞——戥菜刀！”

记得一位卖五香豆的小贩喊着：“冰糖甘草五香豆，两分钱来买一包。”一位卖佐料的担子喊着：“葱姜酱醋大蒜头，糖盐味精小苏打。”朗朗上口，仿佛是念一副对子。卖麻花的挎着竹篾篮子白天由年轻人叫卖：“糖麻花，盐麻花，馓子枯麻花，咸宁金牛酥麻花。”叫起来声调高而脆，比较有生气。卖桂花赤豆汤的大多是浙江妇女沿街叫卖，武汉人往往听成“贵话耶——差的差”。因此武汉人有时对朋友的争执常说：“你那是上海人卖稀饭，贵话，差的差。”收废品的高喊：“玻璃洋铁皮卖。”小伢们编成笑话：“剥你娘的皮卖。”等等，不胜枚举。这种吆喝是一种无形的招牌广告，由于它迎合了买主的心理，很能招徕生意。

代声是以其他物器声音代替叫卖的一种标志。老武汉的挑担剃头匠多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四处奔波、收费低廉。他们所挑的

担子与众不同，一头是个上装镜子下带火盆的木头脸盆架；另一头是带小抽屉的长凳，抽屉放剃头工具，抽屉下面放一只盛水的小木桶。剃头匠一边赶路，一边会用一种称为“唤头”的铁器，发出响声，招揽生意。剃头匠之间还有许多行规俗约，如“唤头三不鸣”，就是过庙不鸣，以免惊动鬼神；过桥不鸣，怕惊动龙王；过剃头店不鸣，怕搅了同行的生意。

除极个别用吹奏声做代声外，绝大多数采用打击声。行医郎手里拿的串铃（环形的响铃，套在手上一摇便能发出清脆的响声）；武汉过去的铜匠担上“咣嚓咣嚓”作响的金属串片；瞎子算命旁边有个小孩牵着，边行走边拉胡琴。

有人将叫卖声与代声相结合，效果更佳。20世纪30年代武汉街头的货郎，手执二尺余长一根木棍，棍上穿一面皮鼓（形与演唱大鼓一般大小，鼓身左右缀两个小木球，穿绳定位）和一面直径约二寸的小铜锣，同样缀两个小木球于左右；举手摇动就鼓锣齐鸣“噗冬冬当啷，噗冬冬当啷”。货郎吆喝：

“雪花膏、美人胶，香水、香肥皂；冰片扑粉、爽身粉哎——蚊子一见就会滚，宝宝一宵睡安稳哎——”货郎这一串亦庄亦谐的吆喝，常常引来一些家庭妇女前来观看、挑选。

同样夏天卖冷饮的小贩总是一边使劲用小木条敲打着冰棍箱，一边吆喝着“雪糕冰棒，美丽牌冰棒”。过去武昌司门口鼓楼洞口，设有夏令应时小摊，摊头摆有一块人造冰，一侧是玻璃杯装糖水，有顾客到来，摊贩使用一小刨子将冰刨下一掬，放入杯中即成。叫卖时，摊贩手夹着刨子和玻璃杯，使得其相碰叮当作响，一边吆喝道：“刨冰一个大角子（一个铜元）一喝，又解凉又止渴！”

幌子与牌匾

幌子是古代店铺用来招徕顾客的形象性的商品标记，历史极为久远，具有重要的民俗特点。《韩非子》中记载：“宋人有沽酒者……悬帜很高。”可见用旗帜做幌子为时很早了。其实幌子就是古代商业广告的一种常见形式，主要是兜售生意，招徕顾客，宣传和扩大影响，在长期商业经营中，这些招幌得到人们的公认，已成为约定俗成的特定标记了。

幌子大致可分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类。形象幌以商品或实物、模型、图画为特征，如理发店门口三色灯，如“亨达利”钟表店门口就以一口正在运行的大时钟为标志，旧时汉口民生路口的“朱绍盛”绍酒店门口以悬挂一只锡壶为特征。标志幌主要是旗帜，如卖酒的酒帘，门前总是撑出一幅黄色布酒帘，上面只写一个“酒”字；有的还在酒帘上绘一只酒坛，上书“太白遗风”四个大字。1931年从统一街木兰宫迁过来的皮货店，如盛昌隆、瑞贸盛、泰隆及新店宏泰、复盛祥、大华、恒兴、昌记、合众等曾扎堆于后花楼街。其加工或出售皮货的店铺作坊，大都悬挂翻毛（毛朝外）皮袄实物为幌，或于袄上书写字号。如“盛昌隆”皮货店门首两侧，各于檐上挑出一件皮袄为幌，另挂一只写着“西口粗细羊皮发庄”字样招牌。一家皮货铺所悬皮袄上写着“瑞贸盛皮铺专熟皮袄”，下缀幌绸。有的皮货店还有悬挂特定的木牌作幌，即串联绿、黑两色梯形木牌，两下角分别绘有象征皮毛的饰纹。文字幌多以单字、双字简单标示经营类别，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当铺的一个大“当”字；茶、酒、书、帽等字幌即是。

清末民初，在武汉的街头已有外商的广告了，这些外商颇知中国幌子广告的意义，也“入乡随俗”。如英国人开的汇丰银行，门前就立一个铜狮子为幌子，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则用“飞马”为幌子。这些洋幌子又含有商标的意思。

牌匾与幌子一样，是传承已久的中国商业习俗的重要表现形式。与幌子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不同，牌匾多用以指示店铺的名称和字号，是店铺的标记。这两者都是物象广告，也是店铺门面装饰的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店铺赖以生存的依托。

我国古代开设一家比较像样的店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要设计出一块好的牌匾，那必须是选料精良，做工精细，还要金漆大字涂写，这样的牌匾能显示出店家的气度和财气。从制作工艺的角度讲，更能显示出庄重华丽，非常招人喜爱。

一般情况下，横放在门口上方或店堂正上方的牌匾，其主要内容是该店铺的字号或名称。多不惜重金请名宦或名书法家题写，然后油漆贴金，如“邹紫光阁”“显真楼”“恒春茂”“蔡林记”金字招牌悬挂门楣，店主当然感到格外风光。至于“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则更是商业信誉的保证，因此即使兄弟分家，也不愿意放弃老字号店名。于是汪玉霞的两个糕点店以六渡桥为界，分别加“雨记”“为记”；胡开文笔墨店前各加“贞记”“诚记”“恒记”，以示后继者虽异，却一脉相承。“永茂盐号”兄弟分家后招牌分别是“永茂仁”“永茂义”“永茂礼”“永茂智”“永茂信”。这些分店各自经营，互不干涉。

还有一种是立在柜台上的竖招牌。此招牌也有放在柜台两头或放在包柱上的，并

结合行业性质，选择高雅含蓄、有宣传性的词句。如药铺的“寿域宏开”、鞋店的“平步青云”、绸缎店的“锦绣光华”、典当铺的“利在便民”。此外，还有耸立门外3~5米高的冲天招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顾客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这家店铺的牌匾。规模较小的店铺为招徕生意，也不得不制作一面较小的牌匾，题写着“公平交易”“言不二价”“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字样。店铺老板已不满足于顾客仅仅了解店名货种，还力图以多种方式将商品的优质和店主的诚实公布于众。

商业字号

人有姓名，店有字号，字号就是商铺的名字。传统的店名是富有民俗特色的。

清人朱彭寿在他著的《安乐康平室随笔》里，把名目繁多的字号取义，找出有共性的56个字，编成一首七律：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正合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

为了迎合顾客喜慕吉利、兴盛的心理，多数商家都采用以上吉利字面作为店铺的字号，如第一位的“顺”字，就有“顺香居”酒楼、“东来顺”清真餐馆、“祁万顺”酒楼、“车和顺”茶庄、“周恒顺”机器厂、“风雨顺”海味号等，这不仅吸引着众多追求吉祥如意的顾客，同时也寄托着经营者祈求兴盛、长久、招财进宝的愿望。这样的店名现在随处可见。

老武汉的一些店铺字号，至今在顾客中仍有很高声誉。如酱菜店“老锦春”、浙帮参燕号“葆元”、回鱼大王“老大兴园”、

豆皮大王“老通城”、汤包大王“四季美”等。

商店经营门类往往体现在店名之中，这也是商业字号民俗的一个特点，其好处是能使人过目不忘。如照相馆有“品芳”“雅光”“显真”“铁鸟”等；眼镜店“精益”“光明”“汉明”等。近代的汉口餐饮业更为明显，突出一个“香”字，如民生路的“川味香”、汉阳三里坡的“野味香”、岳飞街的“一品香”、江汉路的“菜根香”素菜馆、华清街的“湘香”米粉馆等。

店名也会因行业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色。一般经营文房四宝、装裱字画、古玩玉器的店，为了追求古朴典雅，多用“斋、阁、轩、苑”命名，如武昌的“齐芳斋”、汉口的“荣宝斋”装裱店等。中药店常用山名命名，如荣山、仁山、寿山等，《汉口竹枝词》中有“市井也知仁者寿，招牌一半借山名。”因《论语》中有“仁者乐山”“仁者寿”之句，以山名作店名，寓意其店所售的药服用后既祛病又增寿。有的中药店多用“堂”作字号，如初开堂、刘有余堂、济生堂等。理发店常用“厅”字命名，如香港理发厅、南京理发厅，长生堂是一个例外。浴池则以“清泉池”“龙泉池”“鑫园池”“东华园”相称。

在历史悠久的汉正街和花楼街，店铺鳞次栉比，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招牌。餐饮饭店多用“馆、楼、园”，如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记清道光年间汉口的名菜馆云：“金古（楼）会芳（楼）都可吃，坐场第一鸣鹤园。”如花楼街口的大吉楼、楼外楼（后改为汉口大旅馆）。茶馆则多以“泉、春、园”命名，如涌金泉、洞海春、汉南春、楚江园。武汉的西餐馆，旧称番菜馆，以“春”为名的特别多，如一江春、海天春、第一春、万回春、普海春等。票号一般取财源通达之意，如百川通、三晋源等。汉正街还有一些店铺



长盛裕烟袋铺实物幌子

以物品产地为招牌，或以雅字奇字为招牌，较著名的如“兰田宝”纸扇、“玉露斋”烧腊、“只处高”皮画。

店名也忌用字不当，如汉口有家毛笔店，开始叫“邹紫寅阁”，后来有人指出寅属虎，悬于店首即白虎当头，白虎是凶神，白虎星是灾星，店主即改名“邹紫光阁”。

字号如同人的名号一样，顾客对字号的信赖关系到买卖的兴旺，许多老字号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以致形成口碑。如“伍亿丰，挤不通”“曹祥泰不愁卖”“买雨伞找苏恒泰”“高洪泰的锣响当当”“叶开泰的药痨死人是好的”“汪玉霞的咸酥饼——绝酥”“谦祥益的房子——内外强”“没有谦祥益的布不出嫁”“曹正兴的镰刀割（搁）得好”“九千年的膏药——贴你一身”“万寿堂的规矩——瞅准初一和十五”“高黏除的膏药扒（贴）得紧”“庆盛祥的瓜皮帽——体面”等。

取字号名有些店铺讲究中国传统文化，古色古香，回味无穷。如山东来汉的“谦祥益”绸布店，据考源于《尚书·大禹谟》的“谦受益”一语。湖南长沙来汉的“九如斋”，其店名出自于《诗经·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取“顺意、发达、永恒”之意。

在商号取名的格式上，传统形式以用三个字者居多，这样便于记诵，也有店家起两个字的，但民间为了说着顺口，时常在其后面加一“记”或“号”字，如朱锡记算盘店、谈炎记水饺、黄云记棕床店、白海记旗袍店等，也有直接冠以姓氏的，如曹祥泰、伍亿丰、汪玉霞、筱陶袁等。

商业楹联

古往今来，经商者在店铺开业之日，均请文人出对，雅士命笔，题写对联，张贴于店门两侧门柱之上，或悬挂于店堂壁间显眼之处。商业楹联既可烘托喜庆气氛，又含有希望店里生意兴隆，财丰福远之意。其实，商业楹联的组合是十分讲究句词的诗情画意、精巧典雅的，一副好的商联不仅能美化门面，招徕顾客，而且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仍觉奇妙无比，意趣非凡，耐人寻味。

武昌显真楼照相馆开业不久，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前来拍照，觉得拍的不错，曾为之题写对联：“孝友人家多厚福；江山佳处想当年。”老板严添承如获至宝，悬挂店门两旁，生意接踵而至。老汉口的街头巷尾常有卖自来水的水桩，有一处水桩小屋前贴的商联：“江汉自来水，水来自汉江。”下联是上联的倒用，点明这自来水的来源。这

“挑水夫”在当时也有一副对子：“挑担一路赶求户，户求赶路一担挑。”盎然成趣。

在商联中多用于嵌字联，武昌司门口有家“张宝源”水果行，店堂上方贴过一副对联：“张罗四方美果梨桑栗棠香尔宝；源发千迢时鲜苹荔蕉蔗甜乃号。”这副商联，双头双脚共嵌有“张宝源号”四个字。像这种规格的提对，在汉口黎黄陂路上的“太平洋浴池”的门面上也有一副：“太清涤垢听是荡；平流除污望若洋。”汉口华清街上的“明园”浴池的商联更见佳妙，其进门屏风上写着“明来明往，一席拍波击浪，袒胸互白相照应；园幽园雅，几度驾雾腾云，洁身自好独领春。”这副商联双头嵌进“明园”二字，还把澡堂的景象含蓄地作了一番描述，非常恰当。

（王琼辉：武汉市商业学校原政教处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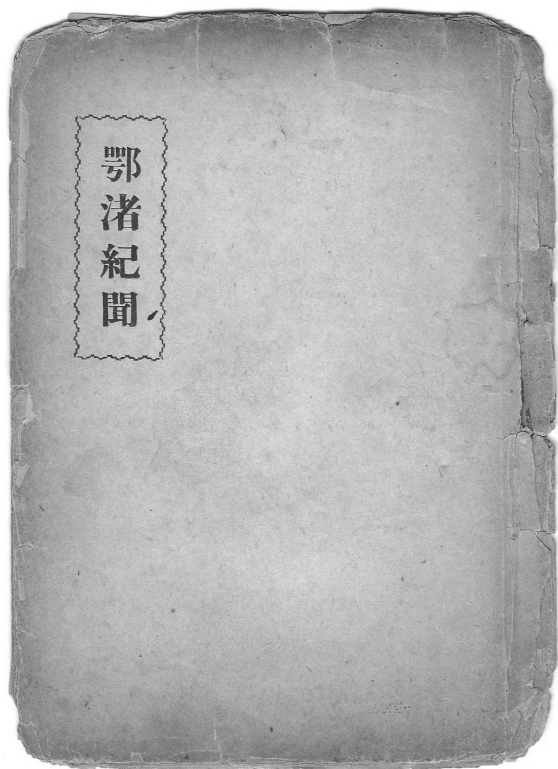
潜翁《鄂渚纪闻》

◇ 王晓清

《鄂渚纪闻》，铅印本，一册。作者自序中有“潜翁识于武昌旅次”，“潜翁”为笔名或化名，不可知。潜翁明言《鄂渚纪闻》为“壬寅春客鄂”所纪自己所闻，此壬寅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这已是张之洞湖北新政的晚期了。《鄂渚纪闻》卷末有“湘江渔父”跋，湘江渔父为谁何？亦不知其详。细按湘江渔父跋语中有“吾鄂”字样，应该是鄂籍人士而在湖南任事者。湘江渔父跋语中谓寻访潜翁其人而不复得其姓氏，只知潜翁有刘伶癖，买醉三山二水，为当世隐君子。湘江渔父评价《鄂渚纪闻》“事覈而词诡，语婉而旨严”，不能将其视为志怪诙谐之语。《鄂渚纪闻》卷尾印刷有“桃源巷口种花人手录”，亦为化名之人，此人与潜翁为若何关系，亦不详知。《鄂渚纪闻》无版权页，无出版年月日期，一卷二十面十页，后附《鄂渚纪闻勘误表》，据这一勘误表，几乎每一页均有印刷错误，其错误包括漏排字、衍字、多字、字体倒置、字迹模糊，

其印制粗糙由此可知。由版式、字体、印刷格式分析，当系民国初年出版物。

据《鄂渚纪闻》载，潜翁在张之洞督鄂期间供职武昌善后局。善后局执掌鄂省军政、财政、庶务，位高权重，直接听命于总督，因而闻见富而交际广，笔之于书，多据实而有本原。作者在自序中谓：“武昌濒江，登高望远，悠然旷然，时携酒凌鹤楼，陟洪山，望夏口夷塞，缅胡曾遗烈，听游人野老之闲论。虽传闻异辞，不可据为典要，而根触于余心者良多。”潜翁对武昌风俗、西学新政是很留心的。他既是客居武昌，自然非鄂籍人，且缅怀胡林翼、曾国藩的遗闻故事，应该是湘籍人士。《鄂渚纪闻》作者自谓壬寅岁客居武昌，卷末有“某公移节以后，鄂人士犹常念之”之语。“某公”系指张之洞。张之洞由湖广总督升任太子太保、军机大臣，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也就是说《鄂渚纪闻》所记载的张之洞湖北新政的截止时间应该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亦



潜翁《鄂渚纪闻》封面

即潜翁在武昌客居时间当有六七年。这一期间正是张之洞督鄂实行新政的晚期。潜翁在《鄂渚纪闻》中以“某公”指代张之洞，以“某”字指代张之洞的重要臣僚梁鼎芬，其他所涉及的军政要人、豪富商董皆以“某”字指代，潜翁在撰写《鄂渚纪闻》时，这些知名人士仍在世，潜翁不直呼其名，显然是有所忌惮避讳的。

晚清湖北新政，犹如一巨大磁石，吸引了全国各省知名之士汇聚武昌。这些饱学之士，或以巍科而为张之洞所青眼相加，或以经古之学，为张之洞所办书院学堂所奥援；或青年才俊，为张之洞所提携，一言以蔽之，当时武昌为全国英才荟萃之区，极一时之盛。因为创办新政，新设衙门多，开厂矿、建铁路、设西学、办度支、充府库，案牍山积，需要人手理文案、催厘金、完卡税。因而幕宾僚佐下隶，需次亟而用人广。鄂省

人才不敷用度，自然就向外省奥援人才。西政洋务者，以广东人士居多；书院学堂之学术人才者，以江浙人士居多。而湖南、湖北人才则散布在督抚衙门等各个部门。潜翁以湘籍人士居武昌善后局，自然是以地缘关系而援引的。

当武汉成为晚清新政旋流中心时，毗邻鄂省的湖南人士到武昌求官、求学、经商、充军的不在少数。我藏有一部手抄稿本，即为湘籍人士手写书信的抄本，其中就有到汉口闻见西洋风俗的记载。这一记载汉口风俗的抄本要比潜翁《鄂渚纪闻》时间早一二十年。这部抄稿，系线装，封面有手写“云鹤山庄”四个大字，每页以绿色竖线分隔为十行，稿本边栏上端印刷有“笔记课本”四字，下端印刷有“徐乐华堂”四字。“云鹤山庄”与“徐乐华堂”是何关系，不清楚。这一稿本，多是一位名为吴淦松的人给马月波、杨文农、刘邵丞、李庭璋、刘星轩、鲍钧静、汤锡棠、沈石斋、杨砚农、象小林、成诚斋、李荫棠、吴云谷、罗星庄、王石友、王篁笙、吴岑云、李小春、吴晋陔、金丽生、毛奉彩、吴甫芝、王鸿浦、王春龄、宋燮廷、彭護生、杨雪樵、曹广泽、于祝鑫、文筱泉、曹润生、陈程初、蔡麓岑、黄应彪、宋少兰、田澧荃诸人的40多封信函。我将该藏钞稿名之曰《吴淦松信稿》。

《吴淦松信稿》第一封信是一位名鲍政的人写给吴淦松的，谈及了在汉口的见闻。鲍政可能是乘船从长沙出发，经汨罗，过洞庭湖，到岳阳，沿长江东下而抵鄂城。鲍政谓曾登黄鹤楼，黄鹤楼在同治七年（1868年）新建，光绪十年（1884年）毁于火灾。鲍政游历武昌、汉口当在光绪十年之前。鲍政在信中谓：“驾一叶之扁舟，游汉皋之市镇，客有与英夷有素者，相与登洋

楼，试洋茶，吸洋烟，观洋女。虽语言不通，而出入迎送，亦略可省识。至无铺张扬厉，耳目一新，诚有使人不可唾处。”鲍政为一介文人，对汉口洋务还不甚反感，在游观汉口市镇后，他在信中一个最大的感慨就是汉皋街衢“灯烛辉煌，中宵为市，一切均已踵事增华，胜我湘中数倍。”武昌黄鹤楼之巍峨，汉皋市镇之繁华，是对湘籍人士的最大吸引。张之洞督鄂大张旗鼓办新政，武汉三镇对湘籍人士的吸引更大。两湖书院招收三湘子弟读书，这一吸引就更巨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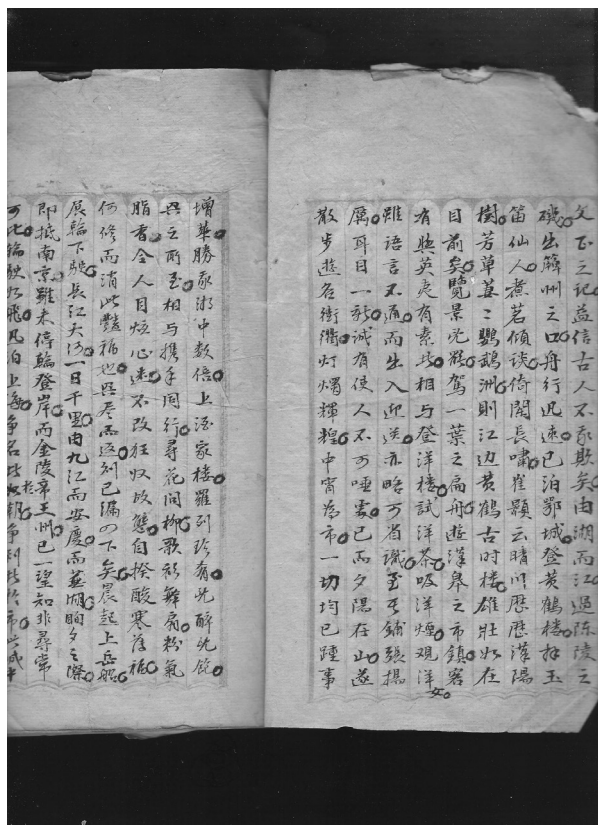
潜翁《鄂渚纪闻》虽非是张之洞湖北新政晚期的实录，但绝非消遣、谐趣滑稽之作。因为作者耳闻目见，访之故老，采之里巷，且以张之洞为要角加以铺叙排比，似可作为张之洞新政之别记。其纪闻纪事，与其他史料互为参验，可证实张之洞湖北新政之政情、经济、文化与风俗。潜翁对武昌兴办厂矿之靡费、财源之开辟拓展、学堂开设之内情、警察制度之创设、西人之傲慢豪横、官场案牍之运作、武人豪吏之跋扈、衙门僚吏之盘剥、底层市民之苦痛、武汉三镇之俚谣风俗，多有记载，翔实而多情节。

以“某公”“某郡守”“督军”而指代张之洞的《鄂渚纪闻》，对张之洞督鄂大行新政略有微词。武昌文昌门、平湖门丝麻四局，是张之洞创设的官办民用工业：“凭江版筑，楼阁场宇，皆极崇闳，规模广大，莫不叹羨。乃购机器，延西匠，置员委，庀物料，役工二三千人，煤烟蔽空，轮机震浪，日出之货，多而易销。”四局不数年即折阅停工，“唯余飞阁高窗，漾彩于江烟夕照。”

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是晚清重要的军事工业，潜翁对这一新政有“中国军实，津、沪、宁局无此钜观”这一评语。因为枪炮制造事关军事要害，操办之

人亦膺重任而获利厚。“不数年，道府则可握监司之篆，牧令则易而府道，章服加荣，皆制军实之力也。”潜翁以为张之洞湖北新政，官署设置众多，简直是叠床架屋。《鄂渚纪闻》记载有洋务局、商务局、筹饷局、发审局、硝磺局、煤矿局、火药局、土药局、川盐局、牙厘局、膏捐局、灯捐局、签捐局、银元局、铜币局、官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校吏局、警察局、官书局、译书局、清道局、官渡局、农务局、蚕桑局、工艺局。张之洞办新政格局大，不计成本，讲求规模，自然也就不吝惜帑金了。因而潜翁谓：“某公为文称大手笔，其用财手笔尤大。”

张之洞将轻车简从当成步武西法、变革官仪的一大关键。在通衢大道车驾驰骋，张之洞“翎颤珠摇”，路人皆叹其劳苦功高。潜翁记载了不少张之洞的逸闻趣事，谓张氏



《吴淦松信稿》节选

有异才、有异习。这一异习就是张之洞昼寝夜办公，总督府白天少人进出，暮色则车水马龙：“官属之白事，州郡之投文，胥吏之出入者，麇集皂趋，鹄立鹤跂，人声灯影，环门如市。”潜翁这一记载与张之洞族孙张达骧的叙述是相互印证的。张达骧谓张之洞性情乖僻，每日下午2时始入睡，至晚10时乃起治事，以致被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为“兴居不节，号令无时”。而大臣李瀚章则以“夙夜在公”为之回护。

《鄂渚纪闻》记载了张之洞在武汉三镇创设的警察制度，裁撤保甲而设警察，目的是“诘奸宄，弭盗窃，禁凶暴，检非违，止斗争，救灾患，清道路，稽夜行。”这一办法不可谓不善。但在施行中却往往出现偏差，“通衢闹市，或时见二三衣警察衣者，蹀躞于途，或闲玩于杂物之肆。支街僻巷，则足音杳然。”张之洞命警察统一着装为红色衣服，市民以为不吉利，目警察似粤匪，当时武汉三镇流传一首歌谣：“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张之洞1902年5月裁撤湖北保甲总局，创办武昌警察总局，委任梁鼎芬为总办，候补知府金鼎为提调，按察使李岷琛为督理。下设东、南、西、北、中五个分局；城外分设东、西、水、陆四个分局，聘请曾任上海租界巡捕房捕头的英国人珀蓝斯为总目，训练所募之警勇员弁。《鄂渚纪闻》记载珀蓝斯居所即邻近两湖书院的邮政局。珀蓝斯去职后，张之洞又聘请日本教习继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武昌阅马厂设立警察学堂，张之洞晋京前夕，湖北警察学堂更名为湖北省高等巡警学堂。

创办学堂是张之洞文教新政的重要事项。当时武汉三镇有江汉、经心、两湖三座书院，新创武昌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将弁

学堂。学堂聘请西人教习，学堂生员学习优异者即公费派往日本留学。新学堂以张之洞的心腹梁鼎芬为总监督。科举废止后，张之洞设普通文学堂、武学堂、师范学堂，仍以梁鼎芬为监督。潜翁对张之洞视为心腹干将的梁鼎芬亦有微词，以“武昌某守”指代梁鼎芬：“其先官翰苑，被议黜，援例为知府，长记诵，敢大言，以圣贤自居，而矫饰以立异。”警察制度为梁鼎芬向张之洞建议而兴办的，当时武汉有一联语将梁鼎芬（字节庵）讽刺挖苦了一番。联语为：“梁木其萎乎，砍节目还须分两片；集金殃民者，饕餮肉当加廿二八刀。”在潜翁的观察中，学堂生徒也是不守规矩之辈。“值西人星期，诸生休暇出游，命儔啸侣，皆短衣深领，箭袖皮鞋，松辫紧身，纸烟风镜，佯长衢巷，酣歌酒寮，叱咤暗鸣，千人皆废，见者知为学堂书院之俊。”潜翁的这一记载加深了读者对湖北新式学堂生员的另一侧面的理解。

《鄂渚纪闻》这一具有掌故性质的湖北近代史料，虽然篇幅短少，似可视为张之洞湖北新政之野史琐记，其中多记载新政本原与民众物议，从中读者可大略窥知晚清武汉三镇政治经济之变局、文教之兴盛起灭、风俗转移之轨迹。《鄂渚纪闻》不知是印量少或者是印本不易蒐集，至今尚还不为研治湖北地域史志者所引据使用。即便如史学名家章开沅主编之皇皇巨著《辛亥革命辞典》，亦无《鄂渚纪闻》之扼要介绍。故特表而出之，以期引起治晚清湖北暨武汉地域史乘者稍稍留意焉。

（王晓清：武汉广播电视总台高级记者）